易读

2026年第4期

本期关注 AI写作



AI写作VS人的写作

读书救了我

乱世为笺，诗心为炬

借鬼画说人话

东莞图书馆 DONGGUAN LIBRARY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准印证号：(粤S)Y0265033号



李康腾　绘

电影和电视不啻是书本的头号“敌人”，因为这两者只需要被动地接受，而阅读却是种负责任的行为，需要主动去理解。

——（法）丹尼尔·贝纳

易读

2026年第4期

2026年第4期（总第63期）



主　办：东莞图书馆
主　编：冯　玲
副主编：杨河源
编　辑：麦志杰　唐　燕　李正祥
张宽路
美　编：梁明晖
地　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路98号
邮　编：523071
邮　箱：yidu@dglib.cn
电　话：0769-22834154
微　信：yidu-dglib
开　本：大32开
页　数：118页
印　数：1000册
出版周期：季
出版日期：2026年10月
准印证号：(粤S)Y0265033号
印刷单位：东莞市本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送对象：本系统内部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本出版物部分文章来源图书、报刊和网络，旨在发挥图书馆的作用，推荐好书、好文，促进全民阅读。所选文章经著作权人同意，其中，个别作者因地址不详，暂时无法取得联系。请原文作者见出版物后与编辑部联系。

卷首语

冯玲

九月，国家文旅部先后发布《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同步明确深化开展全民阅读服务，充分体现了全民阅读在文化建设中的基础地位。文旅发展规划强调“提升基层公共图书馆馆藏质量，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服务，推进书香社会建设”，体系规划更在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章节，设置“高质量开展全民阅读服务”专门版块，提供直接的工作指引。

立足发挥公共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不断夯实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基础与优势，要以优质内容的传播推广为根基，深化经典阅读引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特色活动与阅读品牌打造提升影响力，提供稳定、优质、参与性强的阅读服务产品；以特殊关怀落实保障平等阅读权益，面向重点群体补齐均等化短板，实现服务人群全覆盖；以智慧阅读拓展服务场景，适配数字时代读者对便捷性、个性化及深度体验的新需求；以专业培训筑牢人才底座，保障阅读服务质量水平；以社会力量共建共享破解运营可持续难题，共同推动全民阅读从活动走向深度、长效、高质量服务，回应“十五五”规划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目标任务。

《易读》本期关注“AI 写作”，这已是2018年第3期“AI”、2025年第2期“AI：边界与门槛”之后，编辑部又一次聚焦 AI 了。也许从这个角度也说明，AI 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已呼啸而至，无法视而不见。尽管我们心存侥幸，怀疑 AI 是否能突破人类精神创造的边界，现实却和 AI 写作相伴而行，很多问题亟待重新思考。《AI 退思录》警觉地提出深度 AI 时代改变了文化习得的方式，会不会引发文化溃退？表达对随之而来的“伪文化”“反文化”的忧思。《AI 味儿？人味儿？》以编辑视角谈论新时代语境下所遇到的 AI 写作问题，以及“人的气息、生活毛边”是什么？认为写作是“独家记忆”，建议别把这个权利轻易交给 AI。《AI 写了5%，还是思想被改变了5%？》讨论了 AI 介入判定的复杂性，技术检测能否区分“AI 润色”“AI 参与”和“AI 写作”？“作者”究竟是指谁？

AI 接受阅读人写作的书来训练，人在用 AI 写作。答案还飘在风中。

目录

■ 卷首语

■ 本期关注

AI 写作 VS 人的写作 / 许剑波 / 4
AI 味儿？人味儿？ / 张　鸿 / 10
AI写了5%，还是思想被改变了 5% ？ / 肖　鹏 / 14
延伸阅读 / 东　图 / 18

■ 易读问

沈胜衣：读书救了我 / 易读编辑部 / 23

■ 阅读前沿

《太平前夜》：乱世为笺，诗心为炬 / 林　颐 / 27
《纸路》：谁的大地，谁的纸路？ / 韩　健 / 30
《中国菜市场》：护佑菜市场，护佑我们“亲密的吃” / 唐　山 / 34
《幼稚化》：被“情感奶嘴”包裹的公共生活 / 徐朝光 / 37
《天桥艺人》：消失的天桥江湖 / 叶克飞 / 40
新书扫描 / 张宽路 / 44

■ 原汁原作

梁启超与东莞 / 殷柱华 / 50

■ e 读

国家图书馆《赵城金藏》专题资源库简介 / 麦志杰 / 55

■ 艺读

借鬼画说人话——金农与罗聘的反传统策略 / 柯　鹏 / 57
桂林影像中的在地性与物质记忆研究 / 吴毅强 / 61

■ 易读社区

《汪曾祺年谱》有小疵 / 董国和 / 66
读书写作，收藏精彩 / 汤云明 / 68
风骨与温情的精神肖像 / 季　米 / 70
西方视野下古代中国文化的别样探寻 / 方怀银 / 72
守与走：一部侨乡百年心灵史 / 刘学正 / 74
从“父母之命”到“灵魂伴侣” / 任蓉华 / 76

■ 书香社会

卡夫卡咖啡馆·莞：以电影文学升级城市阅读 / 穆　肃 / 78
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寒声暖读”零下 30℃的 3 分钟阅读挑战 / 王党庆 / 81
书香短讯 / 张宽路 / 84

AI 写作 VS 人的写作

许剑波

引言：即使 AI 变身莎士比亚，我们为何仍要执笔？

此刻，当你翻开这一页，或许你的手机正弹出一条由 AI 生成的新闻推送，或许你的同事刚用 ChatGPT 在 5 分钟内完成了一份工作报告，或许你自己也曾对着对话框输入“帮我写一封情书”，然后看着屏幕上流淌出的、工整却陌生的文字，陷入片刻的恍惚。我们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关口。

当 ChatGPT 在 2022 年 11 月发布后的两个月内突破 1 亿月活用户，当大语言模型能在 30 秒内生成结构完整的新闻稿、在 1 小时内创作出押韵工整的诗歌，一个尖锐的问题被推到了每个文字工作者、每个思考者、每个珍视表达的人面前：人的写作，是否正在走向终结？

这场争论早已超越了技术本身。学术界在激辩“AI 生成论文是否构成学术不端”，新闻界在担忧“算法是否会杀死新闻的现场感”，文学界在追问“文学的灵魂能否被代码模拟”；伦理学家警告着深度伪造文本的真实性危机，法学家紧急研讨着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社会学家则忧虑着算法训练数据可能带来的文化同质化。有人欢呼这是“生产力的解放”，有人哀叹这是“写作的消亡”，更多的人则在观望中感到迷茫。

但或许，我们该先回到历史中寻找答案。

历史上每一次工业革命，都端了一群人甚至一个阶级的饭碗，由此引来形式各异的、或激烈或消极的反抗。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出现了“羊吃人”的现象，圈地运动几乎消灭了传统的英国农民阶层；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的出现消灭了捕鲸业——人们不

再需要鲸油来照明；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基本消灭了手工业，所有的手艺人都几乎失业了。而现在，我们正身处第四次工业革命之中。

这场革命最早从互联网的普及中酝酿，人工智能的呼唤越来越强烈，直到 2023 年前后 ChatGPT 的出现，人们才真正看到了这场革命的雏形。而这场革命恰恰是从大语言模型诞生的——语言背后，实际上是思维。西方过去一百多年关于语言的哲学家很多，不少极为著名，例如维特根斯坦。某种意义上，OpenAI 仿佛是维特根斯坦隔了几十年后的一个优秀学徒——人类过去积累下来的所有语言和文字，构成了它的子宫。语言的干柴，烧红了 AI 的钢水。

两个世纪前，当蒸汽机驱动的纺织机取代手工纺车，英国工人愤怒地砸毁机器，认为机器夺走了他们的饭碗；一个世纪前，当福特的流水线让传统工匠的技艺变得“多余”，人们再次陷入失业的恐慌；半个世纪前，当文字处理软件取代打字员、互联网颠覆传统媒体，“记者要失业了”的论调甚嚣尘上。但历史最终告诉我们：技术淘汰的从来不是人类本身，而是过时的生产方式；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在将人类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推向更具创造性的劳动形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深刻指出，机器的本质是“以自然力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技术革命从来不是对劳动者主体性的否定，而是生产力跃升的必然路径。今天，AI 写作的本质亦是如此——它不是“写作者”，而是“语言生产力工具”，是蒸汽机之于体力、计算机之于算力的延伸，是人类语言能力的延伸。

然而，这一次的革命有其独特之处。历史上的工业革命主要用机器动力代替人的体力劳动，而这一次 AI 革命的主要特征，是要代替人的一部分脑力劳动。AI 从大语言模型发展起来，它首先“吞噬”的，恰恰是靠语言谋生的传统写作。AI 的写作能力几乎是毁灭性的，特别是那些人类长期积累的、有着具体明确写作格式和知识要求的文本——律师行业的法律文书，教师行业的教案与评语，学

术规范明确的论文写作，行政公文系统，乃至某些社会批评和社会批判的写作领域。如果你让 AI 把鲁迅全集读完，然后按照鲁迅的风格写一篇指定命题的文章，那么你很可能会得到一篇足以乱真的“鲁迅新作”。

正如历史上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阶级反抗机器替代人的手工技艺一样，AI 写作正在冲击今天主要靠文字生活的几乎所有行业。如果把人的写作仅仅当作一种谋生手段来看，AI 对这样的写作的替代正呈现出毁灭性和颠覆性的效果。这当然引起了以文字为生的人的抵抗和反抗，这些反抗形式多样：从专业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从道德的角度。

因为人的写作，有着算法永远无法替代的核心价值。

鲁迅写《纪念刘和珍君》时的悲愤，沈从文写《边城》时的温柔，史铁生写《我与地坛》时对生死的叩问——这些文字之所以穿越时空打动人心，是因为它们背后站着一个有血有肉、会痛苦会思考的人。AI 可以模仿修辞，但无法真正“感受”痛苦与喜悦；它可以生成优美的句子，但无法拥有对生命的切身体验。

写作本质上是思想的锤炼过程。一篇优秀的评论文章，其价值不在于辞藻华丽，而在于作者对问题的独特洞察；一篇扎实的学术论文，其核心不在于格式规范，而在于研究者对真理的追问。AI 可以整合已有信息，但无法提出真正原创的问题；它可以生成看似合理的论证，但无法承担思想探索的风险与责任。

文学、哲学、历史写作根植于人类文明的深厚积淀。《红楼梦》中的世情百态，《论语》中的伦理智慧，《史记》中的历史洞察——这些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与特定的文化语境、历史脉络、民族精神深度绑定。AI 的训练数据虽然庞大，但它缺乏文化自觉，无法真正理解文字背后的文明重量。

更重要的是，写作意味着立场与责任。当 AI 生成虚假信息或诽谤内容时，它无法承担任何伦理与法律后果——最终承担责任

的，永远是使用 AI 的人。

而回顾文学史，我们还会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市场化的需求，历来是检阅和推动文学与文字创作的最重要的动力。明清之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的诞生与流传，恰恰印证了这一规律。这些作品并非诞生于象牙塔中的纯粹艺术追求，而是深深扎根于市民社会的文化消费需求之中。话本、说书、坊间刊刻，正是蓬勃的民间阅读市场，催生了这些伟大的叙事；正是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追捧与传阅，推动了作者在人物塑造、情节架构、语言锤炼上不断精进。没有市场化的需求，就没有明清小说的繁荣；没有读者的检验，就没有这些作品穿越数百年的生命力。今天，AI 写作的出现同样在重塑文字的市场格局——它让识字不多的人也能完成规范化的表达，让不善于语言组织的人也能与受过专业训练的写作者并驾齐驱。这恰恰是这场革命在文字表达方面的大众化、平等化趋势。而真正经得起市场检验、经得起读者心灵共振的文字，依然只能来自那些拥有独特生命体验与深刻思想洞察的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与 AI 写作共生？

答案或许藏在“欢迎、警惕、利用”这六个字里。

欢迎效率革命，让 AI 处理资料搜集、初稿生成、语言润色等机械劳动，释放我们宝贵的时间与精力；警惕思维惰性，警惕同质化表达，警惕主体性的悄然让渡；利用 AI 作为“协作者”而非“替代者”，构建“人主导 +AI 辅助”的新型写作范式——人是“导演”，负责选题策划、价值判断、创意构思；AI 是“助理”，负责资料整理、初稿起草、语言优化。

技术哲学家唐·伊德曾说：“技术不是中立的工具，它塑造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但最终的诠释权与意义赋予权始终在人手中。”技术可以改变我们写作的方式，但无法替代我们赋予文字意义的权力。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技术永远服务于人，而非主宰人。蒸汽机

没有消灭人类劳动，而是让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计算机没有消灭人类智慧，而是让人类从机械计算中解放；同样，AI 写作不会消灭人类写作，而是让人类从重复的文字劳动中解放，去从事更有创造性、更有思想深度、更有情感温度的写作。

所以，当算法学会写诗，我们为何仍要执笔？

因为写作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生产文字，而是确认我们作为人的存在。那是人类思考的痕迹，是情感的回响，是文明的火种，是存在的方式。只要人类还在思考、还在感受、还在追问，人的写作就永远不会被取代，也永远不应该被取代。

但守护原创性，从来不意味着固守孤立的书写姿态。真正的原创，从不是闭门造车的苦思冥想，而是在充分吸纳一切可用工具的基础上，完成属于人的思想淬炼与表达突破。我们不必将 AI 视为原创性的敌人，反而可以主动将它纳入创作的协作体系——让它帮我们梳理庞杂的资料、搭建初稿的框架、打磨生涩的表达，把我们从重复性的文字劳作中解放出来，从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选题的洞察、观点的提炼、情感的注入这些真正属于人的核心创造环节。

人的原创性，从来不是拒绝工具的清高，而是驾驭工具的智慧。我们借助 AI 的协作，不是为了偷懒，而是为了更高效地抵达思想的深处；不是为了放弃表达的主体性，而是为了让人的思考、情感与判断，在文字中得到更充分、更精准的呈现。AI 可以帮我们完成 90% 的机械工作，但剩下的 10%——那些独特的生命体验、那些犀利的价值判断、那些直击人心的情感共鸣，永远只能由人来完成，而这 10%，才是一篇文字真正的灵魂所在。

必须承认，人的写作与 AI 写作的共生，从来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简单命题，而是一个既充满创新可能、又暗藏严峻挑战的复杂议题。它既带来了效率的跃升与表达的解放，也带来了思维惰性、同质化表达、主体性让渡的隐忧；它既打开了协作创作的新空间，也抛出了著作权归属、内容真实性、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待解之题。我

们不想、也不能为这个议题提供所谓“最终的答案”——因为技术仍在迭代，认知仍在更新，这场关乎表达与存在的变革，本身就处在动态演进的过程中。但我们愿意与你一起，探讨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当 AI 可以生成流畅的文字，我们该如何界定“原创”的边界？当协作成为常态，我们又该如何守护表达的主体性？当效率成为可能，我们该如何避免思考的退化？当工具无处不在，我们该如何让文字始终承载人的温度与思想的重量？

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写作的价值从来不是单一的。对于那些在思想性、情感性和表达性上拥有极高天分的创作者，我们要像守护文明的火种一样，保护他们纯粹的写作——他们的文字是时代的镜子，是精神的坐标，是 AI 永远无法复制的人类智慧结晶。而对于大多数将语言与文字作为职业来谋生的人而言，在坚持创作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借助 AI 提升效率、让表达更精准流畅，这并非妥协，而是一种务实的选择。AI 不是要取代人的表达，而是要让不同层次的写作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让文字更好地服务于思想的传递。

愿我们都能在技术洪流中，锚定人的价值。

愿我们都能善用工具的助力，继续执笔，写下属于人的、有温度的原创文字。

（本文核心观点逻辑架构关键论证由作者完成，写作后期借助 ai 工具最后完成。）

AI味儿？人味儿？

张 鸿

有朋友问我：我们从上小学开始写作文，总被老师要求语句通顺、结构工整、用词规范，可现在AI轻轻松松就能写得比这还标准。我们写作投稿，编辑又说要有人的气息、生活质感，要保留一点“毛边”。这不是矛盾吗？

我笑了，说你来我们杂志社每月一次的发稿会听听，大概就不这么问了。

我是文学期刊总编辑，从年轻时担任一审编辑至今，已经看了三十年的文学稿件。过去我们判断稿子有两把基本的尺子：写得好不好，有没有抄袭。现在加了一把：是不是真人写的。

这个月发稿会，一审编辑亚南把一叠稿子摊在桌上，说这个月又有好几篇“漂亮得不像人写的”的稿件。他说每天打开邮箱，看着那一封封邮件，总琢磨：稿子背后是活人，还是对话框？大家笑了，笑完沉默，各自拿起桌上的稿子。有篇写故乡，句子精致，比喻一个接一个，读三段就腻。有人提议把形容词删了，可删完，骨架没了，细节没了，只剩“故乡”“记忆”“时光”几个大词。另一篇节奏太匀，每段差不多长，句子长短也差不多，像机器铺轨道，顺得让人发困。真人写的东西是有快有慢，有紧张有松弛的，会突然冒出一句不规整的话，会留白，会在“气口”上“断气”。AI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只会一直铺下去。

发稿会上还遇到一种更麻烦的情况。有篇历史散文，作者引用了某位名家的一句话，我说这稿子应该是借助了AI，查一查，尤其是文中引用的“金句”。编辑一查，原话不是这样，也不是那位名人说的。AI会“自信地”编造史料和资料性的文字，编得很像那么一

回事，你一用就掉坑里了。可这不能全怪机器，用的人不长心，工具就成了陷阱。

我不是保守的人，也经常使用 AI。但工具就是工具，看你拿它干什么，但同时也为我们的文学生态焦虑。网上流传“48 小时生成 500 万字小说”的教程，部分平台投稿里 AI 生成比例高达五成。当“写作”被简化成十几个字或者几十个字的输入指令，那文学作为“手艺”的一面就被架空了。大量同质化 AI 稿涌来，编辑打捞好作品越来越难。本来文学期刊就是沙里淘金，淘出好作品，现在沙子翻了无数倍，真正有个人声音的来稿反而被淹没。

边界在哪？我们编辑部讨论过。现在共识大致是：AI 查资料、校对语法、整理时间线，可以；涉及文本实质生成，让 AI 写初稿、续写、扩写、润色到改变原文风格，就触线。2026 年 8 月，24 家以地方文学内刊、中小型文学刊物为主的杂志联合发表声明：“一经查实系 AI 投稿，列入黑名单，永不采用该作者作品。”话比较重，可那是对文学底线的坚守。你可以用 AI 查一个词的用法，不能让它替你决定一句话怎么写。区别在于：是你握着笔，还是笔握着你。

我个人的标准更朴素。一篇稿子到我手里，如果我读不出一个具体的人在某个具体时刻的真实反应，它大概率有问题。AI 润色最危险的地方，不在改了多少字，而在把作者原本毛糙但有生命力的表达，“修整”成安全、无个性的面目。有编辑说，作者把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喂给 AI，生成的修改稿“文从字顺，但个人风格丢失”。我们当编辑的，有时就是喜欢那点毛糙，那点不完美，因为里面有人的呼吸。

说到人味，我想起格非说的，AI 无法取代“个体刹那间的感受与体验”，“你的体验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你就是整个宇宙”。比如，经历过亲人离世的人写悲伤和没经历过的人写悲伤，文字可能差不多，可前者的悲伤里有细节重量，有哀伤：亲人离世时的最后一滴泪、临终前不断嗫动的嘴唇、有谁没到场的遗憾。AI 没有经历，它

能写出“悲伤”，但写不出是什么让人悲伤，更写不出“悲哀”。

人味还藏在“不完美”里。作家鲁敏设计新书封面，特意用不完美的手写体和朋友的即兴画，说这是“用有缺憾的人力创作，呼应我们作为不完美人类的本质”。人类写作的魅力，在于会出错，会犹豫，会在不该停的地方停一下，会在该收的地方多说两句。AI 追求优化，文学有时需要的恰恰是不优化。塞壬在东莞工厂打工写出的文字、写更年期的感受，AI 生成不了；李娟笔下阿勒泰草原的细碎温情、写与母亲的对立关系 AI 也生成不了。那些文字珍贵，不是因为完美，是因为被活出来，不是被算出来。

检测软件也靠不住，我们编辑部测试过，用 AI 检测工具测一篇十三年前在刊物上发表的散文，被判为 AI 生成。编辑工作中，年轻编辑对 AI 味敏感，但审稿经验不足；老编辑经验丰富，对 AI 认知有限。最好办法是坐下来，经过三次审读过程，一字一句，读节奏，读细节，读有没有体温。

回到开头。工整规范是写作底线，人的质感是写作灵魂，两者不在一个维度，并不冲突。标点正确、语句通顺、逻辑清晰，像说话讲普通话，目的是让人听懂。但规范只是容器，容器不等于内容。AI 最擅长打造容器，一键修正病句、理顺段落、美化措辞，交出一篇零错误文本。可很多 AI 文字，干净好看，却没有人的味道。

编辑说的“人的气息、生活毛边”是什么？毛边不是故意写病句，不是潦草混乱。毛边是独属于你的生活痕迹：私人记忆，细碎真实的情绪，生活里并不圆满的瞬间，只属于你的观察视角。比如写加班，AI 会写：夜色沉沉，打工人满身疲惫，依旧心怀期许。工整漂亮，套在谁身上都成立。带着“毛边”的普通人可能写：深夜走出写字楼，冷风扑过来。口袋摸半天找不到电瓶车的钥匙，手机不停弹低电量提醒。闻到路边烤肠很香，转念一算这个月开销，还是骑上“小电驴”径直往前冲。同样通顺规范，可里面藏着真实的窘迫和权衡，AI 很难生成。AI 能帮读者“读到你”，自己的写作能让

读者“读懂你”。守住内心真实的毛边，借工具把容器修得规范通顺，别为了容器完美丢掉最珍贵的自己。

对年轻写作者，我有三条小原则。没思路，让 AI 提供两三个角度，只做参考，文章自己写。写完句子不顺，让 AI 润色，但故事、细节、情感得是自己的。需要素材，让 AI 当图书馆查资料，别直接端走它做好的菜。写作是这辈子的“独家记忆”。文字里装的是你亲眼所见的世界、用心体会的悲欢。想象力住在你真切的感受里。别把这个权利轻易交给 AI。

制度当然要有，可制度只能拦住最明显的 AI 代写，拦不住“人机协作”到模糊边界的灰色地带。更根本的守护在写作者自己。有评论者建议：初学写作者应有意识创设“零 AI 训练环境”。不是排斥技术，而是先成为能独立完成表达的“人”，再考虑要不要用工具。自己还不会走路，拐杖又有什么用？

AI 来稿不会消失，只会越来越多。我从焦虑、排斥，到现在的平静。我相信：稿子到我手上，如果读到一个活人在某个真实时刻的真实反应，那种东西骗不了人。反过来也一样。年轻的写作者，别怕慢，别怕笨，别怕写出来的东西不够“漂亮”。机器可以写“母亲”，但不是你的亲生母亲。我常说，AI 写的是“妈都是妈，但不是你的妈”。它也写“爱情”，但写不出“你走了，房间空了”这样的情绪。它也写“沉默”，但写不出父亲暴怒前，瞪着眼睛的可怕的安静。

发稿会散了，窗外下雨。有人把一叠稿子留在我桌上，我拿起最上面的一篇，文字不算漂亮，句子也有点毛糙，但有质感。我读着读着，忘了看时间。

AI写了5%，还是思想被改变了5%？

肖　鹏

这篇小文本来的题目是《AI写作的伦理边界》。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就决定使用AI。事实上，在写作过程中，我也的确利用了AI——这一点，必须在文章开头直接说明。棘手的是，我究竟用了多少AI？这个问题委实难以回答。您所看到的文字都经过了个人的选择、判断和重写，我从未直接把AI生成的一段话原样放进正文。可在写作过程中，我不断和AI交流，它为我提供灵感、帮忙梳理案例、寻找不同观点，甚至有时候“跳出来”给我提供那么一点情绪价值。我（以及我的文字）被它所改变、所塑造，有时候也被扭曲，这些文字因为AI的介入而全然不同。2024年，日本作家九段理江凭《东京都同情塔》获得芥川奖后公开表示，作品中大约5%的文字直接采用了ChatGPT生成的句子，由此引起广泛讨论。“5%”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么，在我们这篇文章里，究竟是用了5%的AI，还是10%、20%？诸如此类的计算其实无法成立。

生成了多少文字，这个能够被判断出来吗？OpenAI在2023年曾推出AI文本分类器，当时的测试只能把26%的AI文本正确识别为“可能由AI生成”，同时把9%的人工文本误判为AI文本，后来又因准确率不足停用这一工具。此后检测技术持续进步，但效果一直不够理想。Saha和Feizi在ACL 2025的一项研究中，对多种检测器和1.5万份不同程度的AI润色文本测试，发现检测器很难准确识别AI究竟参与到了什么程度，也可能把仅经过轻微AI修改的人工文本判定为AI生成（《几近AI，几近人类：检测AI润色写作的挑战》）。许多类似研究还发现，AI检测工具会把特定的语言表达

特征当作机器生成特征，直接抹杀了人类在文本中的贡献。技术能够越来越准确地辨认“像 AI 的文字”，它又能否区分“AI 润色”“AI 参与”和“AI 写作”？

更重要的是，文字或许可以逐字统计，观点和思想却很难折算成百分比。一个观点可能只占全文几十个字，却足以改变整篇文章的方向；一次看似普通的对话，也能使作者领悟原先毫无认知的问题。当 AI 越来越深地进入检索、讨论、构思、质疑和修改过程，用“多少文字来自 AI”来衡量“多少写作属于 AI”，其背后仍然延续着一种前 AI 时代的写作观——这也是当前开展 AI 检测的根本逻辑问题。它仿佛有这么一个预设：人的思想先是完整存在，写作只是把它转化为文字的过程，因而只要能够分清文字出自何人之手，也就能够分清作品“属于谁”。

我们今天关于 AI 写作的许多规则，就是基于上述观念建立起来的。除了文字比例，它们还试图回答哪些场景可以使用 AI、哪些场景禁止使用，使用以后是否需要声明，以及达到什么程度应当标注。但这些规则原本所面对的，是一个作者相对明确、文字生产与智力劳动大体重合、工具主要辅助表达而较少参与思想供给的写作模式。在今天，现实中的 AI 写作很少表现为简单的“让 AI 替我写一篇文章”（事实上，几乎所有 AI 素养教育都在拒绝这一点），更多表现为人与机器在构思、检索、组织、改写、质疑和润色时的持续互动。绝大部分写作者不会简单采纳由 AI 直接生成的整篇文本，普遍的现象恰恰是：人写一部分，AI 修改一部分；AI 提出一个框架，人重新组织；人与 AI 反复对话之后，慢慢形成最终文本。

现有规则框架首先关注的是“AI 生成内容”，进入真实写作场景以后，我们面临太多的变量。让 AI 直接写出一段文字，当然属于“生成”文字；但作者自己写出一段话，让 AI 帮助调整逻辑，是否也属于生成？AI 在前一种场景中的贡献一定更多，而后一种场景中的贡献必然更少吗？再来看另一种情况，作者让 AI 提出 5—10 种论证思路，自己选择其中一种继续让 AI 展开论述，这又该如何认定人与

机器的投入？您所看到的这篇文章则是另一种情况，AI 的内容或许一句话也没有进入最终文本，但它的威能却笼罩全文。AI 的深度介入让我彻底改变了原有思路，重新安排了整篇文章的结构，甚至把题目都改头换面。这样的参与显然不只是“生成了多少文字”的问题。概言之，如果伦理规范只盯着最终文本中哪些句子由 AI 生成，那些没有直接留下文字的 AI 利用反而可能落在规则之外。在这个时代，需要界定的不只是生成内容，还需要考虑所谓的“智能贡献”。

AI 的介入大约存在三个不同尺度：生成了多少文字，参与了多少写作环节，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的思想和判断。正如上文所言，各种“AI 率”通常只能回答第一个问题，对于后两者则无能为力。在当前实践中，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CMJE）以及其他许多机构都明确要求作者披露使用了何种 AI 以及 AI 用于什么目的，并对写作辅助、数据分析等不同用途作出区分。这样的要求表明，学术界已经注意到相比单纯追问“机器写出了什么”，需要进一步追问“机器在写作和研究过程中做了什么”，进入到判定“写作环节”的第二尺度。但其操作性非常有限，因为人机交互本质上是一个深度嵌合的过程，参与了多少基本取决于主观判断，难以用证据说明。

三个不同尺度之间也不是泾渭分明的。如果一篇自然科学领域的英文论文经过 AI 翻译和语言润色，而研究问题、实验、分析和结论全部由作者完成，我们会认为人类完成了大部分学术工作，对此表示认可。但文学作品似乎大有不同，因为文字与语言本身就是文学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许多文学作品的故事并不独特，细致到位的表达亦是题中之义。而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思想内涵与文字呈现之间的关系也远比自然科学领域复杂，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表达即为思想。

半个多世纪前，罗兰·巴特提出“作者已死”，挑战的是作者对文本意义的垄断。福柯则继续追问：社会为什么依然需要“作者”？在福柯眼里，“作者”并不只是简单的文本生成者，“作者功能”与特定的法律和制度体系相联系，在不同类型的话语和不同历史时期中

以不同方式存在，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确认、归属和建构过程最终形成。福柯的追问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启发：AI 究竟只是我们使用的一种工具，还是已经进入到关于“作者”身份的复杂网络之中？ICMJE 等机构明确 AI 不能成为作者，正是因为它无法对作品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承担责任，其底层逻辑无疑是福柯式的。可是，当文字的生成者、观点的提出者、判断的决策者和最终的署名人越来越难以完全重合时，我们今天所说的“作者”，又究竟是在指谁？

我不知道。但请别急着回答。

汹涌的 AI 时代里，我们最缺的不是秒回，而是沉默的勇气与定力。

《张荫麟传》

李欣荣、曹家齐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5 年 12 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K825.81=6/10



本书是一部人物传记，全书约30万字，也是迄今为止近代广东籍著名历史学者张荫麟的唯一传记。张荫麟出生于东莞，为我国经济师学开创者，更被学界公认为“史学天才”，于历史、哲学两学均有造诣，亦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史观，其著作对于史实、史识、时事把握之独到，叙述之清晰，为学界有口皆碑，其代表作《中国史纲》广受大众及史家赞誉。

本书涉及张荫麟在西南联大时期（1938–1940）的教学与生活细节，包括其开设宋史、历史哲学、逻辑等课程并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特别赏识并指导学生李埏、丁则良研究宋史；因清华大学薪资待遇问题与校方产生分歧；以及1939年后陷入与容庚之女容琬的感情纠葛，导致与妻子伦慧珠婚姻破裂，这些个人困境对其经济、声誉造成打击，并成为他离开西南联大转赴浙江大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传作者长期参与张荫麟作品及相关文献的编修，在本传中广泛收集张氏著述、书信，以及时人评价等，以“他观”视角还原了张氏的人生轨迹。

延伸阅读

东　图

AI 写作已经进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大模型改变了包括文本生产在内的多种工作方式，既带来创作效率革命，也引发关于作者主体性、版权伦理、文学价值、人机边界的深度思辨。以下推荐若干图书，供读者阅读思考。

《机器之心》

（美）雷·库兹韦尔著，胡晓姣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TP18/133

经典人工智能读物，回溯机器语言生成的早期探索，理解 AI 写作的技术源流。

《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

吴军著，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8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TP274/328

阐述大数据如何重塑知识生产等商业模式，帮助理解算法生成背后的数据逻辑。

《生成式深度学习》

（美）大卫·福斯特著，马晶慧译，中国电力出版社，2021年4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TP181/240

介绍生成式建模的深度学习工具包，展示生成模型在风格迁移、文本创作及强化学习中的部署方法

《AI 未来进行式》

李开复、陈楸帆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TP18 49/86

以科幻故事＋技术解读，畅想 AI 介入内容创作等领域之后的人类社会图景。

《AIGC：智能创作时代》

杜雨、张孜铭著，中译出版社，2023年4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TP18-05/2

梳理生成式 AI 发展脉络，解析 AI 文本、图像生成逻辑，讨论 AI 写作对内容行业的冲击与机遇。

《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未来视角》

未来论坛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23年10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B82-057/36

收录学界对生成式 AI 伦理的研讨，包含公平性、风险治理、可靠性和可解释性等。

《AI 赋能写作：AI 大模型高效写作一本通》

蔡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H05-39/7

介绍了在各类创意写作和职场写作领域中，如何利用 AI 高效创作的思维与路径。

《AI 公文写作一本通》

辑文公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24年5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H152.3-39/2

介绍 AI 辅助报告、材料，演示公文起草、润色、修改的工作流与技巧要点。

《AI 文案高手速成 118 例：提问生成 + 修改润色 + 热门模板 + 应用案例》

AIGC 文画学院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24 年 9 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G206.2-39/14

丰富的文案实例，展示 AI 生成之后如何做审读、改写与二次创作。

《知识增强大模型》

王文广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25 年 2 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TP18/859

介绍知识增强大模型涉及的各类技术，解析大模型知识生成的局限。

《共智时代：如何与 AI 共生共存》

（美）伊桑·莫里克著，梁家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 年 3 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TP18/726

分析 AI 介入教育、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机遇，倡导理性和 AI 协同，拒绝技术盲从。

《驯服 AI》

（美）盖瑞·马库斯著，黄菲飞译，中信出版集团，2025 年 4 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TP18/928

阐释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总结了它带来的若干威胁。

《投喂 AI：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底层工人纪实》

（英）詹姆斯·马尔登等著，贾青青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6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C91-39/4

揭开 AI 训练数据背后的数字劳动，反思 AI 生成内容背后的代价与伦理困境。

《机器如何学会写作：给人工智能的文学理论》

（美）丹尼斯·伊·特南著，耿弘明译，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6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I04-39/1

揭示“机器写作”并非文学断裂，而是人类将语言与逻辑封装进工具的漫长演化的新章。

《AI 时代的文学教育》

陈平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0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I-42/3

人文学者集体回应 AI 写作，辨析机器生成文本与文学写作的边界，探讨如何守住写作的精神内核。

《AI 中国方案》

薛澜主编，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11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TP18/880

其中专章讨论 AIGC 内容创作，从宏观层面审视 AI 写作治理、版权、产业发展路径。

《AI 职场写作》

黎志锋、杨琳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6年2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H152.3-39/4

聚焦职场典型写作场景，结合传统写作要领，详解如何正确、高效地运用 AI 提升写作能力。

《AI 的狐步舞：人工智能的技术、伦理与诗意》

徐锋著，花城出版社，2026年4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TP18-49/232

以“狐步舞”为隐喻，强调人与 AI 之间应保持节奏协调、相互尊重的共生关系。

《新生成主义》

焦娟、俞昊著，中国出版集团，2026年5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F492/84

提出生成主义四大核心维度精神秩序：“守脑如玉”“开流节源”“清简一烈”“水火既济”。

《此心安处是吾乡：AI 时代的文化认同》

许纪霖、刘擎等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6年7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G115-53/6

讨论 AI 时代如何认识文化与文明、如何面对信仰与坚守的矛盾等话题。

读书救了我

易读问·本期嘉宾：沈胜衣



沈胜衣，本土书生。曾是任职机关单位的业余写作者，现为退休的全职读书人。以双子座的其中一面文学身份，在各地报刊开过文史书评书话、中外文艺札记、植物散文随笔、电影与流行歌曲评介等方面十多个专栏，在纸媒发表和结集逾两百万字，经正规途径公开出版个人专集十二种：《满堂花醉》《你的红颜，我们的手》（均江苏教育出版社），《书房花木》（上海书店出版社），《行旅花木》《行走的书话》（均海豚出版社），《笔记》（上海辞书出版社），《闲花》《笔花砚草集》（均中华书局），《二十四》（中信出版社），《草木光阴》（花城出版社），《大宋花事》《岁时花事》（均华文出版社）。另编有其他书刊。

《易读》：你印象最深刻的第一本书是什么？

沈胜衣：《水浒传》。小时候从母亲处得来一本《水浒》，从此入坑，至今收集的水浒题材书籍已有120种。从前痴迷那些个性鲜明的好汉，打打杀杀的故事；后来也知道，该书有很多不适合现代观念的负面之处；但仍喜爱，因为随着年龄增长、阅世历事渐多，我从中读出了：人性与世态，命运与选择。这四点，《水浒》写得很深刻，看似少年的爽文，实为苍凉的悲剧。

我去年出版的《大宋花事》有长文《水浒草木状》，就是通过考察里面的植物，折射出书中人物如何度过一生，乱世也好盛世也好如何自处，质朴性情也好心机算计也好怎样走上不同道路，人生历程会遇上怎样的得失成败。这是《水浒》仍对我们深有启发之处。伟大的著作和杰出的人物，都能隔着时空，捏住人类的本质。我读虚构的文学作品和

真实的传记访谈，往往就从人性、世情、宿命、抉择这些角度去感受。

《易读》：你是怎样读一本书的？谈谈你的阅读经验。

沈胜衣：读书对我来说有两种，一是精读细读，二是选读速读。对合适的好书，静心展卷，从头到尾，慢慢深读，划线批注，酣畅投入，是一种享受，也是对自我的提升和扩展。但有些书，只需针对性地选看关键内容，或者翻览一遍作个基本了解即可。

那如何选定好书，对一般的书如何做到快速选读？一是多留意资讯，包括各种推荐书单，也包括各类书目（我在线上线下逛书店经常纯粹看看书名过过眼瘾）。二是首先多读基础性的书籍。我大学四年，完整读过的书超过五百本。其实我不是一个好学生，看的多数是与课程无关的杂书闲书，但由此建立个人的精神资源库，形成自己的判断见识，才有了今后选书、读书的能力。

《易读》：回望几十年阅读历程，阅读给你带来哪些影响？

沈胜衣：有本书叫做：《读书毁了我》，但我要说：读书救了我。

回望过去几十年，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城市的平凡人，但也经历过社会的各种转折巨变，遇到过大大小小的关口，有过多次、多样的路向选择，日常中还碰到过诸多方面的诱惑；而能够做到今天的自己——虽则没有什么成就，哪怕在读书方面都很浅薄、留下很多遗憾，但，终归基本能活成自己想要的、自己能力所能达致的样子——可以说，全靠读书。

因为有对书的喜爱，而这种喜爱盖过了其他的兴趣（我确实尝试过不同的生活兴致，有过切实的比较），于是最终留在书斋中，没有走上另一些道路（当然如果我作了别的选择，可能有更好的生活和发展，但那并不符合自己的性情）。这样一种人生，便是阅读带来的最大影响。我真心感激这个世界有书籍，也真心庆幸读书是适合自己的娱乐。

《易读》：你爱阅读，更爱书，忆水书舍的丰盈藏书与清雅环境便可见一斑。那么，你如何看待藏书与读书？

沈胜衣：我并非传统的“藏书家”，更喜欢称书架上的是“聚书”，有缘相聚，日积月累，书籍便成了朝夕相对的良伴，仅此而已。这个时代我们大部分普通人也很难成为真正的“藏书家”，但有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在旁，就是舒适的书式生活。与其说我们人藏书，不如说是书藏人，书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实生活之外的的藏身所。

关于读书，我上两题的回答似乎有点“老登”，但其实读书对我来说真的只是娱乐，我觉得读者不必管包括我在内的别人意见，你从适合你的书中得到快乐就够了。快乐，我认为是人生最高的境界，真正内心的快乐是这个世界的稀缺物，而读书，可以是其中一个选项。

《易读》：你的阅读兴味广泛，后渐趋向花草植物主题，并在此一领域长期深耕，颇有斩获。这是有意选择和别有因缘？

沈胜衣：我认识很多朋友，都从共同的文学大领域出发，后来走入不同的精专范畴：文物，书画、古琴、饮食等等。所以这是个普遍现象，大概都既有意选择又别有因缘。我自己的具体情况，首先还是天性的兴趣，对花草从小就很喜爱。其次是入世愈深、看人愈多，愈发觉得植物比人世纯粹，看花比看人更好，更适合我以读写来打交道。再次是一些恰好，比如我对植物文化的探索和写作，能与原本的文史结合起来；又比如我以前工作中，有的部门正好与植物相关，这类恰巧的联系让我欢喜，更促动我流连在花木丛中。

顺此对前几题的回答找补一下：读书也不全是闲事，同样可以有实用性的。我收集了超过一面墙书架的草木图书，它们既给我带来没用功利性的快乐，又直接帮助我对一些植物问题的研究。所以聚书读书，是完全可以将休闲娱乐与实际用途相结合。

《易读》：在你的众多著述中，对哪一部或哪一些作品更为心仪？

沈胜衣：自己的孩子都喜爱。实在要选，那是：《书房花木》《行旅花木》《行走的书话》《大宋花事》《岁时花事》。原因仅仅是，这几个书名包含了我的不同元素：书斋与旅行，植物与书话，历史与时光。

《易读》：纸本与数字共存的时代，你是如何与阅读共处？

沈胜衣：我曾热切拥抱包括电子化在内的新潮流。但现在的数字化还未完全容纳古往今来纸本书的内容，加上技术性和人性的影响，让我多次碰到网上文章资料的失误，我总结为：AI有幻觉，网读需谨慎。在网络上读到或搜索到涉及学术性等“正经”的内容，只宜作为索引，导引我们去查阅原书，才可放心使用。

当然，网络这种检索之便，是科技进步的莫大好处。但纸本书也有另一种便利，是读到后面如果要翻寻前面的内容，翻书会比划手机页面更方便。

因此各有利弊之下的共处是：网络适合碎片化时间，适合及时掌握资讯，适合娱乐，也适合“读文”；但要真正“读书”，还得是纸本。除了上面说的实际因素，主要是网络始终属新事物，纸本书则承载了数千年的人类文明，书页翻动间，有一份古典而又鲜活的温情。

《易读》：请为《易读》读者推荐五本书。

沈胜衣：《诗经》，我国精神文化的元典。

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虽然作者问题有争议，但无损该书对岭南植物的优秀记述价值。

阿索林《西班牙小景》，最佳的西方散文之一。这本旧书可能难找，也可以看近年新版的他另一本集子《塞万提斯的未婚妻》。

《觉有情——谷林文萃》，谷林先生的读书随笔，是中国现代最上乘的散文小品之一。推荐我编的这本，因为除了精选他的文章，还附录一些独家资料。

《耕读》，再徇私推荐我参与编的另一种，感谢《易读》让它在此留个印记。从2014年至2021年，市农业部门推出了29期这本农业文化读物，立足东莞的农业农村，传播农思，发掘农史，以图文保存工业化现代化城市的农耕文明资料。同时扩展到全国性的农业风物、农村民俗，且结合了文艺的内涵和形式，有耕有读，传承文脉，获得农学界和文化界的好评。这也算是东莞乡土的、广义农事的一份史料吧。

乱世为笺，诗心为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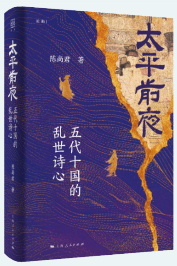
林　颜

五十三载，八姓十四帝。五代十国，一段模糊且晦暗的历史。

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让这段尘封的历史重回大众的视野。跳出对五代十国无序、混乱、荒芜的刻板印象，这段历史究竟是如何承前启后，连接了唐宋两个繁华朝代的呢？我继续阅读相关书籍，遇见了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的新作《太平前夜：五代十国的乱世诗心》。

这本书以时代流变与地域割据为脉络，分八章拼构五代文学与社会图景，从唐末动荡的乱世悲歌，到中原五代的乱世博弈，再到江南、吴越、闽中、巴蜀等割据区域的文脉存续，落脚于史料的考证重构，层层递进、面面俱到，填补了大众对五代十国文化史、社会史的诸多认知空白，完成了一场温柔而深刻的历史正名。

陈尚君深耕唐五代文献四十余年，著有《唐五代诗全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等，主持点校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修订工作，对这段错综复杂的史事可谓烂熟于胸。这本书继续了他一贯的“诗事证史事、诗心证人心”的解读方法，用文史融通的治学笔法，拨开乱世迷雾，窥见世道人心。



《太平前夜：五代十国的乱世诗心》
陈尚君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6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I207.209/140

书中写韦庄，不止写“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婉约，更着重写他亲历长安沦陷后写下《秦妇吟》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悲愤，以及晚年入蜀辅佐王建的政治抱负。陈尚君指出，《秦妇吟》“突破了中国传统诗歌的底线”——中古以前，从未有一首诗歌全景式地描写社会动荡的全貌，杜甫写“安史之乱”也只是远远地、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而韦庄却将自己三年间从长安到洛阳的所见所闻，毫无保留地铺展在读者面前。

写冯道，不止写他历仕四朝十君的“不倒翁”传奇，更写他出身寒微、俭朴自守的早年经历，写他操持朝堂、稳定风气的艰辛，指出“不能用宋人忠于一朝一姓的简单立场来苛责”。写杜荀鹤，一个早年以现实主义笔法谴责军阀暴虐的诗人，最终却投靠朱全忠、设计诬陷恩人，只做了五天翰林学士便暴病而亡。陈尚君在此处只轻叹了一句“人生何苦”，却比任何激烈的道德审判更令人震动。

这些细致入微的考证与解读，打破了“五代无文脉、割据无文化”的观念，证明即使在四分五裂的乱世，华夏的文脉仍未断绝。五代士人在出仕与避世之间努力挣扎，在动荡与坚守中艰难抉择，他们的精神风骨与生命韧性，让文明之火生生不息，保留着乱世之中熹微的火种，为后世的勃兴蓄力赋能。

陈尚君看见的不只是“大人物”，还有那些被历史洪流淹没的小众书写者。他从明初佚名编著的《诗渊》抄本中，发现了名妓徐月英失传千年的完整诗作，此前世人只知她“枕前泪与阶前雨，隔个前窗滴到明”的佳句，偶得全诗，“实属幸运”。他从《重修清溪詹氏族谱》中辑得詹敦仁父子一百三十首诗作，为偏处闽南一隅的清源军政权留下了珍贵的文化记录。他从明人宋珏《古香斋宝藏蔡帖》中辑得杨凝式佚诗，纠正了《全唐诗》错拟诗题的谬误。他挖掘黄滔等闽中诗人的文学成就，考证吴越钱氏家族的家风转向，描摹荆南诗僧群体的文化生态……这些边缘地区的文人活动、文化风貌与社会变迁，这些在正史记载中寥寥无几，常被视作边角料的史事的重新打捞，还原了五代十国更完整的历史图景，也打破了学术研究的地域偏见，开拓了更广阔的视野。

这些发现，或借助域外汉籍，或依托碑帖拓本，或通过珍稀善本，或经由家乘谱录，具体而微地展现了陈尚君辑录唐诗的基本路径，也让读者看到了一位学者在故纸堆中寻宝时的欣喜与执着。陈尚君仔细描摹每一位诗人的创作心境和人生轨迹，让诗歌不再是孤立的文学文本，而是承载时代苦难、映照社会变局的鲜活载体。那些苍凉、悲慨、隐忍、洒脱的诗句，记录的不仅是个人的悲欢荣辱，更是乱世苍生的流离疾苦、时代秩序的崩塌重构。

通过对诗作、诗人的剖析，陈尚君对五代十国的历史地位做出重新定位：五代不是历史的断裂，而是中古中国从士族社会向庶族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山河破碎、士族南迁、文武分途、文化下移，时代的剧烈变动，彻底打乱了六朝至盛唐士族垄断文化的格局。旧门阀在战火中消陨，底层士人获得了发声的时机，文学不再是庙堂权贵的专属点缀，转而扎根民间、映照民生疾苦。历史的车轮飞速转动，世家大族灰飞烟灭，平民文官时代徐徐开启，武人专政的黑暗中已经孕育着文治渐兴的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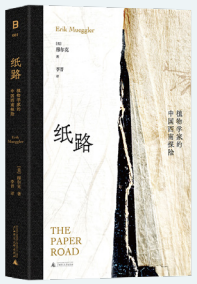
书名“太平前夜”，正是陈尚君对这段历史意味深长的注解。五代十国的硝烟战火，看似摧毁了盛唐的繁华秩序，实则完成了旧时代的落幕与新时代的孕育。武力的混乱喧嚣，倒促文治精神的复苏；士族的没落退场，开启了庶民的时代舞台；疆域的分崩离析，促推了地方文化的多元绽放……黑暗动荡的乱世之中，统一的契机、文化的传承、社会的转型，皆藏于文人的诗行笔墨之中，藏于一代代士人的坚守求索之中。

以诗为镜，照见乱世万象；以心为炬，照亮文明归途。唐诗的骨肉在此铸型，花间词、南唐诗在此成熟，逐渐开启了两宋文学的门扉，文人心态从济世报国转向自省内审，在破碎山河中寻找安放自身的方式。盛世繁华皆起于乱世的积淀，诗心不绝、文明不绝，所有的隐忍与期盼，都是走向大一统太平年的前夜序章。太平前夜，这是最深的夜，也离黎明最近。

谁的大地，谁的纸路？

韩　健

近代以来，随着《北京条约》签订，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方人士纷纷进入中国开展各类考察活动。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英法两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接壤，逐渐成为西方人士考察的重点区域。他们或是出于传教目的，或是为抢占商机，或是开展科学研究，在此留下了一系列考察活动的记录。其中，因云南恰好位于喜马拉雅植物区系与东亚植物区系的交汇地带，生物资源极为丰富，更是成为西方动植物考察活动的重要目的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868年开始，先后有英国博物学家安德森、法国作家保尔西、传教士德拉韦、英国外交官伯恩、美国植物学家喜纳特等来到云南采集动植物标本，这些采集活动推动了这些国家动植物学的发展，而美国学者穆尔克的《纸路——植物学家的中国西南探险》（以下简称“《纸路》”）中的两位主角傅礼士和洛克，正是这批赴云南开展科考活动成员中的两位。全书依托档案资料，采用历史学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研究视角，对百年前两位科考人员在云南乃至甘南的活动做了深度刻画，梳理叙述



《纸路：植物学家的中国西南探险》
[美]穆尔克著
李晋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年6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0948.527/2

了当年西方文化与纳西文化的互动过程，是一部带有民族志写法的历史学著作。

众所周知，关于西方人在中国的科考活动，西北地区，更准确地说是新疆，留存的一手文献数量众多：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拉铁摩尔等西方学者都留有考察笔记与相关回忆录，且大多已有中文译本。而同样地处边陲的云南，尽管也曾有不少西方人士开展过大量考察活动，但公开出版的一手考察笔记和回忆录并不多，较为知名的仅有俄国作家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这种文献存量与实际考察活动规模极不相称。以本书主角、云南植物学研究的重要学者傅礼士为例，他的英文名为乔治·福里斯特，原本是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标本制作师。20 世纪初英国公众对杜鹃花的追捧，促使植物园派遣他远赴云南，采集当地杜鹃花等珍稀植物品种带回国内栽培。傅礼士先后 7 次前往云南、西藏东部和缅甸开展动植物科考与采集工作，共采集了约 30000 份干制标本，为爱丁堡植物园引回 1000 多种活植物，其中包含 250 多种杜鹃花新种，直接推动爱丁堡植物园成为世界杜鹃花研究中心。为褒奖他的贡献，学界特意将他发现的紫背杜鹃命名为“福雷斯特杜鹃”。这样一位云南植物科考领域的重要人物，虽算不上“鲜为人知”（《纸路》序言所述），也始终没有得到专门研究。目前关于傅礼士的研究，仅在《杜鹃花的追求者——西方采集者素描》（耿玉英）《近代西方人在云南的探查活动及其著述》（杨梅，博士论文）《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罗桂环）等少数几篇论文论著中略有提及。究其原因，主要是傅礼士并未出版过关于云南动植物采集的研究专著或回忆录，他当年的科考材料和书信也一直深藏于爱丁堡植物园。《纸路》一书恰好充分利用了爱丁堡植物园乃至英国外交部的档案，通过傅礼士的来往书信、日记、地图等原始史料，还原了他 1904-1931 年间在云南的科考采集历程。而本书书名“纸路”的核心含义，正是这些纸质档案所记录描绘的云南考察之路。我相信，还有更多散落在欧美档案馆中的云南科考档案，等待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学者去发掘，这也正是

本书的重要贡献与启示。

当然，《纸路》并非只是一本传记，正如作者所言，“它关注的是这些植物学家在中国的社会关系与历史情境”。而在这些社会关系中，联系最为密切的就是植物学家们在中国的合作者，具体来说就是跟随他们的帮工。作者用很大篇幅叙述了植物学家与中国帮工的故事，尤其是开篇提到的赵成章，让我自然联想到程美宝的《遇见黄东——18—19 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两个人都是在英国雇主的档案中被发掘出来的，他们在中国名不见经传，却展现了中外交流的别样图景。在以往的叙述中，参与中西方交流的大多是王公大臣、仁人志士，但日常层面的真实交流，其实就发生在这些“小人物”身上。正如程美宝所言：“黄东的故事，尽管很可能曾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的广州、澳门一带口耳相传过，丰富了许多本地少年人对远邦异域和自身前途的想象；他和许许多多小人物，从古到今千千万万，用自己的方法缔造着世界……”

的确，赵成章们并非言听计从的帮工，作为纳西族人，他们有自己看待世界、塑造世界的方式。他们与傅礼士的交往，是纳西宗教与西方科学的碰撞，是两种世界观的交融，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纳西族人的真实反应。在近代变局中，我认为影响最深远的不是政治体制的变革，也不是科学技术的引进，而是整个社会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即“知识与制度体系的转型”。但在以往的研究里，中西碰撞的主要研究对象大多是以汉族为中心的群体，偏居西南的少数族群并未成为这场近代化叙事的核心，而《纸路》一书为我们呈现了纳西族群遭遇中西碰撞的具体个案。傅礼士按照西方的动植物分类方法和地理知识开展植物标本采集工作，而赵成章们则依照纳西族认识世界的方式参与采集，二者各自形成了对大地的文化体验图像，也就是书中反复提及的“地景”。正如作者所言：两种地景融合于这项工作，它们都由纸和大地制作，只是以不同方式被层层叠加，一种地景成形于被叠加的植物标本和包裹它们的纸张，成形于对大地的总览及其纸面的描述，这个把纸和大地

包在一起的过程关乎科学分类的建立和分类的解体……这一过程遵循的是相当具体的原则：如何区分物种，如何精确描绘植物，如何发现表述的极限……另一种地景同样是纸张与大地的叠加，这是一套用文字表达的旅途档案，在充满仪式力量的诵读中被诉说，在行走中被重温。这个地景同样被具体规则塑造，这些规则大多关乎记忆：如何用一套符号把一句诗意的话嵌入记忆，再把这句话在诵读中带回到当下。”两种地景若能保持一致，采集工作便可顺利推进；而当二者发生冲突时，赵成章们会按照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推进采集进程，最终使傅礼士作出妥协。因此，在这场以植物采集为共同目标的中西交流中，二者并非他者与主体的关系，而是互为主体。作者在叙事过程中摆脱了西方中心，通过考证还原了纳西文化视角，这是我认为本书最精彩的地方。

走笔至此，我想起了自己十年前的甘南之行，那里正是书中洛克涉足探险的区域。百年时光匆匆而过，洛克当年欣赏的美景依旧留存，当地藏民也融入现代生活，但在我看来，他们的精神世界依然扎根于本民族的传统之中。当时，深谙藏族文化的导游一路为我们讲述这一地区的历史与现状，就是为了避免我们带着错愕感，用过于现代的思维打量他们的文化与生活。旅途中，这种带着他者视角的打量就曾惹怒过一位藏族小沙弥：一位游客给在一旁玩耍的小沙弥拍照，这个看似平常的举动却让被拍摄者十分生气，强烈要求对方删除照片。因此，摆脱他者的眼光，学会站在主体的视角理解，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关乎道德，甚至关乎我们的世界观。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跳出自身的主观视角去看待他人，以“了解之同情”的眼光去看待古人，因为理解与尊重既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一道始终需要我们面对的难题。

护佑菜市场，护佑我们“亲密的吃”

唐　山

《中国菜市场》基于作者10年间对全国各地超过200个菜市场的田野调查，对我国城市菜市场全景式观察和深入分析，探讨了菜市场的历史、摊贩群体、菜市场背后的供应链、食物消费文化、城市公共管理等议题，挖掘中国特色的菜市场本身的韧性和活力。

“你是来做生意的吗？”10年前，为完成博士论文，钟淑如来到Y市某菜市场做人类学调查，却一头撞上“厚墙”——摊主们拒绝回答提问，偶尔有好奇者会这样反问。

钟淑如承诺免薪打工，却无摊主肯“雇”，托关系，她才过上每天给切好的鱼撒盐、装袋子、打扫卫生的日子，“老板”薇姐的认可是下班前拿来一套防水围裙、一双水鞋，说：“明天穿这个，别把自己的衣服弄脏了。”但她始终不是钟淑如的朋友。

在中国，几乎每座城市都有菜市场，有的嘈杂喧嚣、质量不稳定，人人都能说



《中国菜市场》
钟淑如著
光启书局
2026年7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F323.7/15

出一大堆“上当”的经历，价格也比超市贵，可许多人还是天天逛。摊主们怨气似乎更大，熟络后，他们都会对钟淑如倾诉：“我现在这么辛苦，就是不想让我的孩子继续干这一行。”事实也差不多如此，“摊二代”均转行。

社会飞速发展，年轻人对菜市场的态度两极分化：内向者视之为“地狱”，他们害怕摊贩们过度热情下的强买强卖，将其与落后、不卫生、喧嚣联系起来；也有许多年轻人为“发现附近”，将菜市场视为City walk中的重要内容。

打入菜市场“内部”，钟淑如才发现这是一片江湖：“有些人可以给你一餐饭吃，但不会给你留一条路”；67%的人靠亲戚入行；仅10%的摊贩能雇人，要么做得太好，要么工作太苦；83%的摊主没上过高中……

有的夫妻到Y市碰运气，下火车就后悔——这里看上去太穷了，可离乡时轰轰烈烈，马上回去没法交待，只好暂时留下来，却一留就是30年；有的人赚到了钱，可“40岁不到，已经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病缠身”……

海南女性以勤劳著称，Y市菜市场中，70%的摊主是女性，好丈夫会在妻子“跟客人舌灿莲花的时候，他就在一旁麻利地杀鱼，面无表情，沉稳得像把市场的嘈杂纷扰都隔绝了，伫立在自我结界里”，坏丈夫游手好闲，甚至家暴。钟淑如因“有文化”，帮一位女摊主起草离婚协议，可离婚太难了，女摊主几度放弃，几年后再遇，她终于挣脱了，代价是孩子归男方，她有了新男友，不想再结婚……

很多摊主坦言，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是“自由”——每天工作超14小时，常遭意外打击，可只要还能主导工作节奏，他们就能忍受。一位摊主原本靠拾荒生存，如今她摆水果摊，天天能闻到果香，她喜欢这个工作的“干净”。

然而，菜市场终究是有意义的。老一代居民挑选、争吵、讨价还价，从中获得“熟人感”，在日益“麦当劳化”的社会中，菜市场充

满不确定性，给普通人以选择空间，人们总能找到可信的摊主，总能找到瞬间的感动——世界理性而冰冷，让“相遇”如此稀缺，却被菜市场保留了下来。

有了更便宜的网购、大超市，为什么还要菜市场？因为“新鲜”，人们坚信，只有本地菜才“新鲜”——口味更佳，更有营养。买到“新鲜”的食物，是对识货者的奖励，也是诚信度的检验标尺。

“新鲜”未必全是物理事实，可能更多来自文化建构，但它至少证明了，一个社会仍在运转，仍具建构能力。随着“技术新鲜”愈发成主流，“亲密的吃”渐行渐远——“吃”正与个人体验分离，转为制度化保证，现代人在家能吃到全球风味，却不会对任何一个地方产生归属感。“吃”从具身实践，蜕变为维持延续生命的任务，可“好好吃饭”都不会的人，真能找到自我吗？

钟淑如完成了她的论文，此后仍持续关注菜市场——在“农改超”等推动下，大型菜市场越来越少；涌现出大量“僵尸菜市场”，旧形式还在，却不再提供“新鲜”的本地菜；摊主们不再强迫症式每天精心摆放几十种鲜菜；所谓“升级”，多聚焦在装修、宣传；年轻人更沉迷于网购……我们真要从此告别菜市场？失去菜市场，又该到哪里去寻觅强关系社会给予的复杂、多元、嘈杂、悲悯的教诲？

《中国菜市场》中没有答案，却赋予每个读过这本书的人不同的思考与感慨。（本文刊登于 2026 年 8 月 19 日《北京青年报》）

被“情感奶嘴”包裹的公共生活

徐朝光

9月29日，特朗普在华盛顿“建设美国黄金时代”活动上发表演讲，高调宣布推出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网站。在这场充满科技狂热与商业发布会色彩的演讲中，他将复杂的联邦官僚系统重组、隐私安全保护以及技术伦理等宏大议题，压缩成了“一切都在你的掌中”“只需提出需求即可立即得到答案”的童话般承诺。这种将国家治理“APP化”的倾向，并非单纯的技术升级，而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社会学切片。它恰好印证了海沃德在《幼稚化》一书中所作出的尖锐论断：“幼稚化的晚期资本主义世界里，成人思维被削弱”。

在政治与公共治理领域，“成人思维被削弱”表现为对即时满足的狂热追求，成熟的公共治理本要求公民具备理解结构性困境的耐心，以及接受利益权衡与妥协的理性。然而，当下的政客们不再试图向公众解释复杂性，而是用最简单的口号和“一键式”的许诺迎合选民。正如特朗普在演讲中所描绘的，公民不再



《幼稚化》
[英]基思·海沃德 著
尹楠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26年7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C91/394

需要面对成千上万份表格和繁琐的规则，一切繁琐都被抹平，取而代之的是“只需轻点几下鼠标”的即时快感。这种治理逻辑剥夺了公民深度政治思考的空间，将原本应当承担公共责任的“公民”，降维成了只需滑动屏幕、追求个人便利的“消费者”。当政治承诺变得像外卖配送一样即时且轻便时，民主审议的严肃性便被消解在了算法的顺滑体验之中。

在消费层面，海沃德写道，通过塑造“大小孩”消费主义，资本家能够“将相同的产品销售给处于人生各个阶段的消费者”。这一论断在当下的流行文化中得到了完美的印证。以当下的电影市场与文创消费为例，曾几何时，成年人流行的是探讨人性幽微与社会困境的严肃剧情片，而如今，漫威，迪士尼等超级英雄电影和 IP 衍生周边却统治了银幕、成年人热衷于收集盲盒、穿着印有卡通图案的联名 T 恤、在主题乐园里排起长队，甚至将儿童节视为属于自己的狂欢日。

我观察到许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其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类动漫手办与“盲盒”公仔；在通勤地铁上，成年人们戴着耳机沉浸在治愈系的“童谣化”播客中，市场不断向我们兜售逃避成人责任的特权，在这种模式下，延迟满足被视为一种过时的美德，而“我想要，且现在就要”成为了新的社会潜意识。我们被鼓励停留在无忧无虑的“玩耍”状态，因为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大小孩”，才是最完美的消费者——他们无需被引导去欣赏复杂的审美，只需被不断投喂熟悉的、安全的、能带来即时快感的“情感奶嘴”。资本主义正是通过这种对“童心”的浪漫化与商品化，消解了成年阶段的深度与严肃性，从而实现了文化产品在生命周期上的无缝收割。

海沃德还对现代信息传播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能与有意义的面对面交流和体验实现妥协平衡，数字连接就可能像古老的黏稠树脂将昆虫困在琥珀中一样，只不过这一次，被封存并埋葬在成年前期固定状态中的将会是年轻人”。在高度数字化的今天，这种“琥珀化”效应正悄然蔓延，算法推荐构筑起信息茧房，短视频和社交媒

体的碎片化信息剥夺了人们长篇阅读和深度思考的耐心。当年轻人习惯于用表情包表达情绪，用“一键三连”替代严肃的公共辩论时，他们的心智便如同被包裹在树脂中一般，停滞在一种追求即时反馈的“未成年”状态。这种心智的固化，不仅削弱了个体应对现实挫折的韧性，更让整个社会在面对复杂危机时显得尤为脆弱。

《幼稚化》深刻剖析了教育体系退化为“有补助托儿所”的荒诞现实，在中小学，成人权威日益消亡，教育者一味迎合学生情绪，导致纪律涣散与标准降低；在大学校园，“安全空间”泛滥与过度保护催生了逆向社会化，本该走向成熟、直面现实挑战的青年，反被纵容退行至巨婴状态。这种教育生态剥夺了年轻一代承担责任与独立思考的能力，本书宛如一记警钟，直指温情主义泛滥对心智的戕害，呼吁教育回归其塑造独立人格与培养抗挫力的本质，否则社会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际代价。

然而，《幼稚化》并非只是一本唱衰现代性的悲观之作。海沃德在揭示危机的同时，也试图唤醒一种“成人的抵抗”，他提出“构建更加成熟社会的 10 条准则”。成年不仅仅是一个年龄刻度，更是一种需要不断争取和维持的精神状态。无论是国家治理的宏大叙事，还是个体生命的日常抉择，都不应被简化为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或一键搞定的傻瓜操作。

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我们看透个体困境背后的结构性力量。海沃德的《幼稚化》正是这样一把解剖刀，它精准地切开了当代社会光鲜亮丽的外表，露出了其内里柔软而缺骨骼的实质。如果我们继续沉溺于被算法喂养的舒适区，继续容忍公共议题被降维成情绪化的口号，那么我们不仅会失去处理复杂现实的能力，更将失去作为现代公民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重拾对深度的敬畏、对复杂的包容，或许是我们对抗这个幼稚化世界的第一步。

消失的天桥江湖

叶克飞

相声大师侯宝林是曾经历过旧时代的曲艺界人士。1917 年出生的他，1929 年曾师从颜泽甫学艺。旧时拜师学艺难免吃苦，《天桥艺人》一书就记录了侯宝林当时的生活：“在师父家，他学艺几乎每天都要挨打。他一天的活动是这样的：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将煤球和火炉收拾干净，点着，等浓烟冒过，烧上一大壶水，然后就去坛根喊嗓子，估计水快开了，就回来扫院子、倒垃圾。早饭后学戏两小时，然后去买东西做午饭。午饭后，背着大罗锅师兄与师父一起去云里飞场子搭班卖艺。吃过晚饭后，他又背着大罗锅师兄去天桥的福长街二条、石头胡同等下处卖唱，至午夜回家。在这期间，师娘嫌他吃得多，就给他很少的钱，让他单独做饭吃，但他根本吃不饱。他穿的衣服是师兄剩下的衣服。因为实在受不了，年少的侯宝林也逃跑过。”

京剧演员梁益鸣被誉为“天桥马连良”，他 1923 年加入天桥“群益社”科班学习，后来在天桥演出近 40 年。

《天桥艺人》中写道：“地处天桥的群益社的班主收入不多，经费紧张，在群益社学戏人的食宿也就格外简单。晚上，梁益鸣他们 50 多个孩子挤在一张大炕上



《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
岳永逸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2026年7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K825.7=7/14

睡觉。每天的伙食都是玉米面饼、稀菜汤，只有正月初一到初五、中秋节这 6 天能吃细粮与新鲜蔬菜。在近代，按照‘打出的戏子，摔出的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打不成材’等固有观念，‘打戏’是学戏最普遍也最正常的学习方式。小时候记忆力不太好的梁益鸣‘整年从头到脚没断过血迹、肿块和伤疤’。从早到晚的棒打鞭抽，一度使十余岁的梁益鸣产生过轻生的念头。”

同样，自幼就喜欢唱戏的新凤霞，聪明好学、机灵勤快，会伺候师父、干家务活，仍避免不了天天挨打的命运。

“天桥”位于宣武区东部正阳门外，桥下为由西向东的小河龙须沟。明清两代，它是皇帝祭天坛、先农坛时必经之路，故命名天桥。不过，虽然拥有天桥，其所在的南城仍然是底层聚居地。这是因为清政府采取满汉分城而居政策，使城市空间作为一种“权力配置”的空间意义更加分明。《天桥艺人》中写道，内城乃统治集团居住、生活的地方，康熙十年（1671 年）议准：“京师内城，不许开设戏馆，永行禁止。”这使得在相当长的时期，京城供人娱乐的戏馆都云集于外城。“对于外城的各色人等而言，越靠近内城城墙居住，人的身份地位也就越高，相反，其身份地位也就越低。不仅是人，戏园的分布也同样如此。这自然强化了天桥低下的阶层属性，也基本决定了在天桥长期谋生者的来源：首先是在政治上没有特权的人，其次是在都市中无以为生的人或者是乡下流落到都市的难民，以及长期被主流意识形态轻视的没有‘良民’身份的乞丐、妓女和艺人等边缘群体。”

光绪年间，天桥原有高桥身被拆，改为一座低矮石板桥。后经多次改建，1934 年全部拆除，但天桥作为地名始终保留。

岳永逸认为，北京的“杂吧地天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他在《天桥艺人》中写道：“广义的天桥，以天桥南大街为轴，东西横跨宣武、崇文两区，其北到珠市口，东北到金鱼池，东南到天坛公园西门，西南到南纬路，西到万明路、西经路。狭义的天桥，仅指在老人们记忆中存留的，有各种卖艺表演的，包括三角市场、公平市场、先农市场等在内的天桥西南侧，方圆不到二里的地方。”

民国初年，天桥地区不再承担旧日的皇家出行功能，逐渐成为繁荣的平民市场，被视为老北京平民社会的象征之一。正如齐如山

在《天桥一览序》中所言:“天桥者,因北平下级民众会合憩息之所也。入其中,而北平之社会风俗,一斑可见。”《天桥艺人》中也写道:“伴随长期的内忧外患,在晚清作为权力配置结果的京城的不同部分的空间属性已经出现一定的变化,可天桥依然与贫贱、卑微、肮脏、丑陋以及邪恶联系在一起。这里是自视为‘上等人’不愿去的地方,是如蚁的‘贫民’和没头没脸的下层阶级的‘乐园’。”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民初时期天桥聚居者的成分变化。鸦片战争后,洋货大量倾销至国内,传统自然经济遭遇冲击甚至瓦解,大量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民国初年又天灾不断,导致大量农民流落城市。还有在清亡后失去特权的满人,也被迫流入底层劳动市场。许多天桥艺人都是落魄满人,如相声艺人常连安是正白旗人,评书艺人连阔如是镶黄旗人,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养父是旗人,河北梆子艺人“珍珠钻”是镶蓝旗人,相声创始人之一、穷不怕朱少文和“云里飞”白庆林都是满人。

在岳永逸看来,狭义的天桥是一个“含有文化情感(feeling)和情绪(mood)的,与人的地位、等级、身份等互动,并影响人对社会分类的地域概念与思维符号。”

这个都市空间依然存在,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天桥和与之相匹配的人群的生活已荡然无存。《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一书以田野访谈与文献资料为依托,聚焦老天桥底层市井艺人群体,立足民俗学视角解析天桥杂吧地的兴衰流变。

作者岳永逸试图用十余年的田野调查呈现消失的天桥江湖,他在《天桥艺人》中深入走访侯宝林、关学曾、朱国良等诸多艺人及其后人,梳理江湖艺人拜师学艺到卖艺的人生历程,铺陈各种江湖习俗和传统曲艺的传承,剖析天桥作为边缘江湖空间的社会特质,深挖底层艺人所处的江湖文化与时代社会的深层关联。

江湖艺人是天桥平民文化的重要象征,据记载,当时许多江湖艺人在天桥“撂地”,即在地上画个白圈儿,作为演出场子,行话叫“画锅”,意味着有饭可吃。

《北京地方志》记载,当时的演出类型包括杂技、曲艺、摔跤、硬气功、说书和相声等,其中最具盛名的是身怀绝技而又言行怪诞的“八大怪”。

“八大怪”并非指八个人，不同时期有不同说法，“清末的穷不怕、醋溺高、韩麻子、盆秃子、田瘸子、孙丑子、鼻嗡子、常傻子，到中期活动于民初的耍蛤蟆的老头、老云里飞、花狗熊、耍金钟的、傻王、百鸟张、志真和尚、程傻子再到活动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小云里飞、大金牙、焦德海、大兵黄、沈三、蹭油的崔巴儿、曹麻子、赛活驴等等，有数十位艺人名列其中。”

此外，孟小冬、碧云霞、琴雪芬、张宝华、梁益鸣、新凤霞和宝善林等，还有相声和评书领域的常连安、侯宝林、连阔如和郭瑞林等都曾在天桥卖艺。虽然也有不少天桥艺人以荤段子、黄色小调等表演吸引眼光，但也不乏能够严格约束自己、功底扎实过硬的艺人。

中国自古有三教九流之说，天桥卖艺人就是下九流中的最底层。这些人或是因灾荒战乱背井离乡，或是无父无母的孤儿，没有土地没有其他资源，原本只能靠乞讨为生，依靠杂技曲艺取悦大众已是人生唯一出路。也正是他们为生计而坚持的努力，使天桥成为传统文化的“集散地”，拜师、摆知、盘道等维系着这个边缘地带的秩序。

这套体系当然有愚昧陋俗的一面，比如书中提到的拜师仪式，需要跪地磕头，还要签“关书”，写明“学艺期间，打死勿论；投河溺井，与师无关”。但学艺的严苛，本身也是社会残酷的体现。学艺的艰辛也从不是结束，卖艺需要的是各种生存智慧和坚守。

岳永逸在《天桥艺人》中总结道：“在天桥学艺、卖艺的街头艺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被主流社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抛出，为生计所迫，基本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社会的动荡、上层权力的更迭、科技的发展、农村自给自足经济的破产及个体本身各异的因素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把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出身、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从四面八方推向都市中的贫贱之地天桥。人们聚拢于此，形成一个传统社会已有的，但又有别于以往的靠卖艺为生的群落。在京城位居‘边缘’和长久以来形成的具有贱、脏、穷、贫等空间属性的天桥，意味着身份地位低下的天桥，连接天地两界而模棱两可的天桥，预示着生活中存在无数变数的天桥，成为这些穷途者的最终出路甚至是唯一的出路。”

这条路无比艰难，却是无数天桥艺人的一生。

新书扫描

张宽路

全球视野中的长征

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联合推出的《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实》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王新生研究员从全球视野解读长征。作者创新性运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解密的共产国际新史料，并参考国民党将领回忆录，以时间为经、以路线为纬，多视角、全景式呈现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从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到爬雪山、过草地的全路程，融宏大战略与战士见闻为一体，真实可信，催人上进。

中华文明有自我修复机制？

在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汉学家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眼中是有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进的《不绝文脉：芝大中华文明课》一书中，以“中华文明何以延续千年而不间断”为核心追问，给出了“以文系之”的三大传统：文字独立于语音流变的超稳定性、儒释道兼收并蓄的思想体系，以及宗族、科学等自我修复机制。全书作者的通识课讲义，共 24 讲，从古典时代直贯抗战结束，适合文史爱好者与专业研究者阅读。

中华文明的代表花木有哪些？

在任疆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此间花木：文物里的中华文明》中有葫芦、梅、兰、竹、松柏、桑、荷、桂、菊等 16 种频繁出现在器物纹样中的花木。作者依托 280 余件文物上的纹样，结合史料文献记载，分析了“宝相花”等经典纹样从自然植物演变为文化符号的千年历程，系统分析花草树木在中华礼制制度、图腾信仰与社会变迁中所承载的精神价值。本书与 2024 年的《此间鸟兽：文物里的中华文明》互为映衬，相得益彰。

怎样研究古建筑?

完全可以跟着曹汛著，文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建筑十讲》来学一学。曹先生师从梁思成，是学界公认的建筑学家和园林学家。本书首次将他的建筑名篇结集出版，收录了有关中国古塔、早期木构建筑、建筑典籍与匠师、中国建筑的海外影响等十篇文章，并配有 17 幅独具特色的“曹汛建筑绘画”。曹先生将史源学与年代学方法引入建筑史研究中，除实地勘探建筑实物外，还努力从文献源头逐条考辨，如《中国南朝寺塔样式通过百济传入日本》用编年排比还原了中国建筑文化东传的完整脉络，有理有据，可读可信。

出国去读中华古籍?

译林出版社推出的《瀛海寻珍：海外藏中华插图古籍览胜》说的就是南京大学李晓愚教授的出国访书之旅。作者花十多年追踪流落英、法、美、日、德五国的 15 五部中华插图古籍珍本——从英国国家图书馆藏唐咸通年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到日本内阁文库藏元至顺年间《事林广记》，再到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清康熙年间《无双谱》，千年流变，终得目睹。书中通过讲述这些古籍的刊刻、流传故事，梳理雕版印刷、书籍装帧、插图用途、图文关系、版画艺术等流变，揭示古籍之古，珍本之珍。

书人书话，一册知交

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夜书房六集：书人与书话》是胡洪侠的第六部“夜书房”了，意趣与思辨一如既往。全书分三卷，以“书人”为线，串起钟叔河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译本留下的出版传奇，宁成春以书籍设计串联起的阅读记忆，再到薛冰笔下的南京书影，扬之水、王笛的学术书缘，俞晓群、刘苏里的书店风云与韦力、王强的藏书之痴等。作者以闲聊式的恳切笔调，记录与钟叔河、黄永年等大家的交往点滴，为业界留下珍贵的记忆。这不仅是一群“书人”的故事，更是一本当代中国阅读文化的素描集。

生命禁区的图书馆

生命禁区意味着建设困难。西藏尼玛县地处羌塘高原，平均海拔 4800 米，只能长草不能长树，牧区 7000 多名孩子根本没听过图书馆。援疆干部孙鹏（网名：猴叔孙鹏）发起公益项目，克服高原缺氧、交通不便、物流昂贵等现实困境，为 1 所初中、13 所小学、24 所幼儿园募集优质童书，搭建起了爱心书屋与班级图书角。放牛娃索朗·次旺在童书熏陶下渐渐显露绘画天赋，成长为小画家，还在央视跨年直播上展示了他的画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这本《天上图书馆》读来但见性情，不睹文字。

李欧梵的世纪回顾

李欧梵在学术上“喜新厌旧”，难以归类，从国际关系转向思想史，再转向中国现代文学，最终成为哈佛大学首位获终身教职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授。译林出版社推出的《我的二十世纪：李欧梵回忆录》中，他以“成长小说”笔法，追忆了战乱童年、举家迁徙、赴美求学，以及执教普林斯顿、芝加哥、哈佛等七所顶尖高校的人生历程。书中既有与白先勇共办文学杂志的青春岁月，也有在哈佛讲授徐克电影的先锋尝试，内容丰富。84 岁的他也毫不避讳感情史，专设一章，以做告解。全书“有深景、有声道、有层次”。

“人言徵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

这是唐太宗对魏徵的评价。青年学者赵帅淇从这句话出发，深耕细耙，以《妩媚的忠臣：隋唐变局中的魏徵》重绘了一个被刻板印象掩埋的复杂生命。中华书局的这本书中“妩媚”是对魏徵进谏艺术的赞誉。他进谏时既坚守原则，又懂得照顾帝王的面子，善于将“纵横之术”转化为“治国之道”，君臣对话的“成果转化率”相当高。作者还从魏徵主持编纂的史书中切入，分析这位瓦岗寨文学参军、窦建德起居舍人、李建成太子洗马、唐太宗谏议大夫的“报国”观念。“忠天下”才是精忠，精忠远胜愚忠。

王安石的茶马垄断

光启书局引进的美国汉学家史乐民（Paul Jakov Smith）的专著《耗尽天府：茶马之路与宋朝的兴亡》说王安石的“垄断贸易”形同饮鸩止渴。宋朝缺骑兵，只能通过茶马古道从吐蕃等族获取战马，供给骑兵。王安石设立“茶马司”这样的“国有垄断企业”垄断茶马贸易，低价收茶，高价换马。一开始确实获马颇多，但吐蕃人很快就消费不起这种高价茶，需求萎缩，市场枯竭，进而四川的茶农也开始成批失业流亡，最终导致了系统崩溃。垄断贸易，劫民夺利，竭泽而渔，难怪千载悠悠，争论不休。

枪炮射程有目共睹，制度差距无形鸿沟

看完周天一博士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弓马与洋枪：一部清朝军事兴衰史》，估计你也会有此感。本书以火器与骑射的冲突为线索，从努尔哈赤的“七大恨”一路写到甲午海战。清军曾吸纳明军红夷大炮建立火器优势，康熙曾用臼炮击溃准噶尔骑兵。然而制度劣势很快显现，精良火枪沦为皇家猎场的玩物，科学仪器入藏深宫成为“神秘玩具”。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仓促布防，搬出来的竟是康熙年间的武成永固大将军炮。全书以政治、财政、社会多重维度对比中外，不难看出，甲午之败，势成必然。

明清时代的倒插门里也有政商联姻

南开大学薛英杰副教授著，天津古籍出版社推出的《倒插朱门：明清时期的入赘婚》是这样论证的。仕宦家庭有时也会主动招赘，投资未来，万历十七年进士陶望龄、清初文坛领袖朱彝尊都是倒插门。相比之下，文人入赘富商家庭明显更好，甚至能两立家室、各祀祖宗。富商虽有钱，但政治地位低下，如若赘婿考取功名，顿时升级到“士农工商”之首，皆大欢喜。而底层佣工、小商贩入赘，则更多是谋生需求，也常因钱粮与岳家爆发矛盾。明清赘婚事关门第、功名、财富、生计等等，人间百态，可窥一斑。

以越剧为镜，鉴女权初兴

20 世纪上海的越剧剧场中已经有了女性公共空间。姜进博士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诗与政治：20 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为我们讲清了原委。她花二十年时间追踪袁雪芬、尹桂芳、筱丹桂等越剧前辈的事迹。这些原本只是乡村草台班里的女孩，进入上海后积极与新文艺青年、中共地下党结盟，通过工会运动和赈灾义演等改变了越剧。而以宁波籍太太小姐、工厂女工为主的观众们在“捧场”“过房娘”中又构建起了女性公共空间。这书以戏曲史着笔，镜鉴性别史、城市史，有料。

番薯玉米粥，唐宋不曾有

因为番薯、玉米、土豆这现代川渝人生活中很常见的“三大坨”都是明代“哥伦布大交换”后才传入中国的。东南大学李昕升副教授以《粮食版图：全球化进程中的“三大坨”与中国》还原了这三种作物周游全球之旅。重庆大学出版社这本书中，欧洲之小麦大麦，中国之水稻小麦小米为主的“粮食版图”都被这三大坨打破，饮食结构开始重组。“三大坨”在中国经历了“风土适应”“技术改造”“文化接纳”的漫长过程，最终演变为“土中三大坨，世代靠它活”的救命口粮。一碗杂粮饭，可见全球化演变。

让动物成为历史研究的中心

美国学者哈丽特·瑞特沃的《动物庄园：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人与动物》就是这么做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引进的这本书初版于 1987 年，是当代动物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作者通过家畜育种、犬展选美、动物保护、狂犬病恐慌、现代动物园、殖民狩猎这六个切片剖析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权力肌理。“科学繁育”和宠物狗选美反映了贵族、中产等阶层的社会影响力竞赛；动物保护、传染病防治、现代动物园等则展现出帝国权力的延伸。作者断言，对动物的“关爱”，其本质还是人类欲望与文明秩序的重塑。

小说大师的环保呼吁

以《断背山》《船讯》等小说扬名的美国作家安妮·普鲁在80多岁转向写出了《无人与水为敌：一部沼泽消亡史》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引入的这本书中指出矿养泥炭沼泽、雨养泥炭沼泽、木本沼泽都是重要的“隐形储碳库”。当人类用运河将它们抽干，被封存数千年的碳便重新释放到大气中。书中详细记录了英格兰沼泽、加拿大哈德逊湾低地、俄罗斯大瓦苏甘沼泽，以及美国奥克弗诺基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生态危机，指出近代的“拓荒与进步”是一场对水的无情战争，也是对人类未来的残酷谋杀。

AI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创造力?

英国科学院院士玛格丽特·博登和计算机艺术家厄内斯特·爱德蒙兹两人合著的《人工智能美学》一书中给出了系统回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的这本书中，博登先将创造力分为三种：组合式创造、探索式创造与转换式创造，就这样把创造力从神秘的天赋领域拉入可分析、可模拟的认知框架。爱德蒙兹则从艺术家的切身感受出发，讨论“写一个计算机程序能否等同于用画笔作画”这一核心。书中还有爱德蒙兹与全球十一位顶尖计算机艺术家的一手访谈，为大家理解 AI 艺术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点。

当平台许诺自由，零工真的拥有自由吗?

美国学者亚历山德里娅·拉文内尔在《奔忙零工：美国灵活就业与数字劳工》中明确回答——没有。中国工人出版社引进的这本书中，作者通过近80位网约车、装修、民宿等平台的从业者访谈，将零工劳动者分为“挣扎者”“奋力者”与“成功者”三类。极少数成功者的案例非常依赖从业者的个人声望等文化资本。她指出，零工经济并非基于新技术的“颠覆者”，而是向缺乏劳动保护时代的倒退，网络平台以自主选择之名，将风险全部转移给了个人。当规则全部由平台制定，零工注定世代贫穷。

梁启超与东莞

殷柱华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贯通政论与学术，横跨政治学、史学、哲学、文学、目录学、图书馆学诸领域，是百科全书式学者。这位开近代新学风气的粤籍宗师，其讲学履迹和学术传承，与东莞有着一段真切而绵长的因缘。本文参稽梁启超和民国东莞学人史料，及北大夏晓虹教授研梁之论、东莞文史学者杨宝霖先生的考证，粗略梳理梁启超与东莞交集的脉络。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莞邑冬学，青年梁启超的新学初践

1890 年秋梁启超结识康有为，执弟子礼。次年入长兴学舍（万木草堂前身）受业。梁启超天资卓绝，勤学笃思，得康门治学要领，1893 年被倚为学长，协理讲学。彼时他年少中举、声名初显，正处于学识积淀、锤炼传道能力的关键期。

这年冬，梁启超首次走出书斋、临莞讲冬学。粤地冬学多冬月腊月开馆，由乡贤延聘知名学者短期讲学，入学者已有一定根基，重在进阶。此番办学由梁启超与同为万木草堂得力门生的番禺学人韩铭基联袂，依托东莞举人尹庆举的本土声望与人脉，由尹代为贴街招、

觅场地。授课旧址在莞城周屋街周氏宗祠（今平乐坊小学）。课程兼顾新旧，既讲授传统诗文词章和科举应试，也把在万木草堂所学的新学要义、《春秋》三传等带入课堂，激励气节。学生练习册用的是“浣雪斋”或“清湘楼”印制的红格笺纸。杨先生考证作业留存题目有《鲁儒讲〈礼〉》（文）、《伯乐相马北空群赋》（赋）、《过香港有感》（诗）等。每纸右上角，梁、韩写有贴堂的次序，并钤“即缴”“贴堂”二印。钤“梁启超印”或“任父”，“韩铭基印”。梁启超留有“妙想天开”“咏古颂圣，作结得体”“研词选韵俱征工雅”等批语。

据杨先生考察，招收的二十余名东莞学子，名字可考的有张伯桢、张沛棠、张伯均、叶觉迈、陈高第、陈官桃、梁家骥、刘衍棻等。有的受梁启发，随后赴万木草堂继续受业，张伯桢、叶觉迈、陈高第、陈官桃便是其中代表。1902 年，东莞中学前身东莞学堂创办，张伯桢等四人成为学堂早期教员，所用讲义就是梁主编的《新民丛报》等。

夏晓虹教授细致考辨了此次冬学，指出“学生最初期待可能更多是在科举、词章技艺的提高，最终收获的却是思想的启蒙。在不足两个月的授课时间里，培养出一批具有新学眼光的年轻学人，再由这些作为教师的弟子在新式学堂传授其说，从而使得新思想与新学术不断辗转播植、生根结果。”数年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倡言“开民智”。东莞对新学启蒙的呼应，早在癸巳年冬就已开启。

梁启超朋友圈里的莞籍学人

民国前期，梁启超淡出政事，沉潜于学术。一批北上治学、各有专攻的莞籍学人，与梁启超结下真挚的学术之缘。

张伯桢（1877—1946），字任材，号子干，又字沧海，别号篁溪，东莞篁村人。1895 年，张伯桢在广州入万木草堂旁听，后正式受业于康有为，曾助康纂辑《孔子改制考》。1910 年廷试中政法科举人，授法部制勘司主事。民国任职司法部。1928 年解职，以著述鬻文为业，不遗余力搜集莞邑先贤著述、地方史迹。

1917 年，康有为避居北京东交民巷美国公使馆，张伯桢受其委托校印《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并在北京琉璃厂设长兴书局，刊刻

经销康有为著作与维新文献。1946 年病逝前夕，张伯桢遗命将所藏康梁书牍墨迹，连同袁督师文物、名人字画共 1300 余件，捐赠北平历史博物馆。康梁墨迹同箱而出，是这位东莞学人对师辈文字与风节最后的托付。少年时那场讲学，张伯桢亲聆其言，自此服膺任公之学；后来他以书局流通师门典籍，以毕生心力收存康梁手泽，让那些纸页上的笔墨，安然度过年岁磨洗，留予后人。

伦明（1878—1944），字哲如，东莞望牛墩人，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他深感《四库全书》采书未尽、校有疏漏，1918 年起在北京琉璃厂开通学斋书店，筑“续书楼”庋藏典籍，矢志续修四库。

伦明早年在广州万木草堂受学于康有为，1902 年考入京师大学堂。翌年，署名“东莞生”寄《无题》七律八首给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梁大为赏识，刊于《新民丛报》连载的《饮冰室诗话》，评曰：“乡人有自署东莞生者，以《无题》八首见寄，哀艳直追玉溪，而言外之美人芳草，字字皆湘累血泪也。”二十余年后，伦明作《怀梁任公先生都中七叠前韵》，追忆此事，其中“爱我诗篇图主客”正是感念任公当年识拔诗才的旧怀。以诗订交外，二人在古籍整理上彼此呼应。伦明知晓梁启超晚年致力于大型书目与清人著述整理，恰与自己续修四库的宏愿相契。伦明诗“迟君书目写祠堂（去岁索余所藏书目，至今写未竣也）”，写的便是这份藏书与目录事业的默契。

1917 年至 1920 年，伦明任教于北大文科，后去职。1928 年，北大重聘师资，梁启超致信文科学长江瀚荐举伦明：“敝同乡伦哲如兄自民国六年至十年曾久任北大文科教席…… 最精目录之学，以独立编著《续四库提要》，已裒然成帙…… 若承罗致复职，必能副我丈作人之盛心也。”经此荐举，伦明重返北大。数十年相知，伦明始终敬重梁启超融贯中西的治学格局与革新魄力，赋诗“大儒人识尊荀况，素学谁云变许行”取譬。1929 年梁启超病逝，伦明悲恸不已，作《挽梁任公先生》，“往复一瓯酒，商量七略书。寝门临哭后，遗稿问何如。”寄尽哀思。

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东莞石龙人，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清华文学院四才子”，所著《中国史纲》文笔精妙、史识卓绝，是近代通史著作的典范。1923 年，未满 18 岁的张荫麟，在

《学衡》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逐条辩驳梁启超关于老子年代的论断，梁启超读后叹其为天才。一次文化史课上，梁启超开讲前特意询寻张荫麟，待其起立，梁启超当众称赞这位腼腆却敢于质疑问难的青年，当面回应他的问题，可见任公的胸襟和对人才的极度疼惜。

1929 年梁启超病逝，正在美国留学的张荫麟撰写的《史学家的梁任公先生》，被称为最能表彰梁任公史学的文章。张后来撰《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文末附笔：“此文初属草时，梁先生尚在世。本当重校付印，先生已下世，竟无从请问以决所疑矣。作者极不愿意于此时举其素所尊敬之学者之旨为错误之例，惟以爱真理故无法避免耳。”哀而不谀，逊而能直，恰是一位后学对前辈最郑重的告别。梁的格局，大在容得下一位青年的质疑；张的可贵，贵在敬其人而不讳其失。学界说梁启超是对张荫麟影响最为深远的恩师之一。张荫麟后来治通史，融通哲学与社会学，重叙事亦重考据，可谓把任公“新史学”的志向，从讲堂接进自己的笔墨里。

容庚（1894—1983），字希白，东莞莞城人，古文字学家、文物鉴藏家。1922 年夏，29 岁的容庚携《金文编》稿本北上，谒罗振玉于天津，得其延誉，破格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1925 年 10 月 5 日，容庚《北平日记》记载：“十时与卢瑞往清华，见梁任公、王国维先生。赠任公《金文编》乙部。”一位以“新史学”开风气的学界前辈，一位为古文字学别开新境的后学，因《金文编》而心意相通。

二人金石论学还有一段掌故。1927 年 1 月，容庚从梁启超处借观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原稿本，梁跋“款识皆荷屋自摹者，矫健朴茂，得未曾有也”。容庚校读后却认为“款识断非吴氏自摹，观款识旁所注小字可证。且所摹有工拙之异，非出自一手。惟书头上朱书‘见《积古》’、‘见《积古》可删’数字，审定系吴氏手笔。”敬其人，却不因人立论、因人废学，足见求实求真的学风。

梁启超发其端，莞邑学人接续的袁崇焕研究

清末国势危殆，梁启超置身变局，借史学书写唤醒国民意识、凝聚民族精神。1903 年至 1904 年间，他在《新民丛报》连载《明季

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称袁“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是深刻影响时代走向的人物。传末长叹：“呜呼！若袁督师者，真千古军人之模范哉，真千古军人之模范哉！”学界评价此文是具有近代学术意义的袁崇焕研究的肇始之作。1905 年，梁启超作《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仍持这视角，提出百年之前六祖慧能、袁督师是少有能系一国轻重的广东人物。

此后，东莞学人代代接续，梁启超开启的袁崇焕研究文脉绵延不绝。张伯桢承梁氏治学方向，是民国袁崇焕研究中用力最勤者：编成《袁督师遗集》《袁督师遗集附录》，梁题签两书；撰《袁督师配祀关岳议案》《袁督师故宅志》《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传》等。他捐资于北京左安门广东新义园修袁督师庙，在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重修袁督师墓，1919 年复于袁督师庙南一里许袁督师故居筑屋，时人呼为张园。其子张次溪承父志，多方搜求史料，纂《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撰《东莞袁督师后裔考》。1952 年，张次溪参与筹策，促成保存袁督师祠墓，同年捐献袁督师庙；1958 年，再将张园移交国家。

当代，杨宝霖深耕东莞乡邦文献数十年，其袁崇焕研究重在考据、辑佚与籍贯辨析，撰《袁崇焕杂考》《袁崇焕籍贯考实》，以扎实史料夯实袁崇焕籍贯东莞的学术根基。又从《明实录》等 30 余种典籍中，辑出袁崇焕奏疏、题本、揭帖、塘报、告示、书信等，整理成《袁崇焕集》，极大扩充相关史料库、深化史实考辨，令梁启超开启的这条学术线索不断得到订正与增益。1985 年论著《袁崇焕杂考》刊于《明报月刊》，金庸读后加按，盛赞其考证“信而有征，博学鸿儒”，修订《碧血剑》所附《袁崇焕评传》时采纳其观点，于后记中致谢，成为学术考据匡正通俗文学叙事的一段佳话。

一场莞城乡塾讲学，深化青年梁启超的启蒙之志；一众都门论学的岭南学人，维系跨领域的学术切磋；一脉袁崇焕研究的考史线索，接续乡贤史事的考订与重估。于梁启超，东莞是他走出书斋、实践新式教育的一方试验田；于东莞，梁启超是晚清新学在本地的引路人，这场讲学与此后数十年交游，启迪了一代代莞籍学人。爬梳这段学林往事，期盼先贤前辈“务实而善思，守正以开新”的治学品格，能为今人所鉴取。

国家图书馆《赵城金藏》专题资源库简介

麦志杰

《赵城金藏》1933 年由范成和尚首次发现于赵城县（今属山西洪洞县）广胜寺，一经发现即震动业界。据考证，该藏经金天眷二年（1139）由潞州民女崔法珍募缘主持开雕，大定十八年（1178）竣工，前后历时三十余载。全藏约七千卷，六千余万字，现存四千余卷。其中 4813 卷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机构亦有零星收藏。《赵城金藏》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版汉文大藏经——北宋《开宝大藏经》为底本覆刻而成，在雕版印刷方面具有典型的北方地区风格，在收录典籍方面保留了许多古代逸失的资料，在文物与文献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被誉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



数字化成果

2016 年 9 月，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正式开通运行。2020 年新版读者门户上线后，对各类古籍及特藏文献资源整合，统一纳入“中华古籍资源库”，该平台遵循边建设、边服务原则。《赵城金藏》作为国家图书馆核心馆藏之一，被列为该平台的重要专题资源库。2017 年 12 月 28 日，国家图

书馆正式发布《赵城金藏》1281 种。此后随着平台持续建设，资源不断充实。该专题库所发布的《赵城金藏》数字资源，主要通过缩微胶片数字化方式将原件转换为全文影像。读者可在平台中浏览经卷的高清全文影像，影像质量清晰，较好地呈现了原卷的纸质风貌与版刻特征，黄卷赤轴、每卷经首“释迦说法图”及“赵城县广胜寺”题记等细节皆历历可见。数字化后的《赵城金藏》不仅使这部珍稀孤本得以广泛传播，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缩微胶片数字化，这部皇皇巨著仅以极小的存储空间即可完整呈现。

使用简介

《赵城金藏》专题资源库可通过“中华古籍资源库”总平台访问，读者无需注册登录即可阅览全文影像，支持单库检索和多库检索，基本检索和高级检索，同时兼容 PC 和移动端。其中，高级检索功能支持对“标题”“责任者”“出版者”“出版发行项”“善本书号”五个字段组合筛选。



资源地址

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List?searchType=10021&showType=1&pageNo=1

借鬼画说人话 —— 金农与罗聘的反传统策略

柯　鹏

乾隆年间的清代画坛，审美格局格外分明。一边是朝廷与正统文人推崇的“四王”画派，彼时绝对的主流标杆。这群画家恪守古法，一生深耕宋元名家临摹，作画讲究笔笔有出处，构图、皴法、设色皆有固定范式，追求温润中正、典雅规整，毫无差错却也缺少新意。在正统派看来，绘画是文人修身雅事，必须脱离市井烟火，摒弃跳脱个性，只求复刻古贤意境。



《晴峰叠翠》
王原祁，1700年

而繁华热闹的扬州城，依托盐商经济，催生了一批打破陈规的画家，也就是后世熟知的“扬州八怪”。他们摒弃摹古桎梏，以画谋生、抒写性情，在正统画坛的围墙外闯出一片天地。其中，金农与罗聘这对忘年师徒最为特别：一人以古拙笔墨颠覆传统文人审美，一人以诡趣画作讽喻世间百态，二人相辅相成，成为清代画坛最亮眼的“非主流组合”。

金农，号冬心先生，是扬州八怪的核心人物，更是一位大器晚成的艺术奇才。很多人不曾了解，这位传世名家五十岁前几乎不曾作画。他半生游历四方、奔赴科考，精通金石、诗文、鉴赏，学识渊博却仕途坎坷，最终落第归隐扬州。断绝功名念想后，他以卖字

卖画为生，五十岁才正式开启绘画生涯，开启了独属于自己的“衰年变法”。

彼时清代书坛，盛行圆润秀美的帖学书法，追求流畅婉转的韵味。金农却刻意反其道而行之，独创一绝“漆书”。他截断笔锋，以秃笔作书，笔画横粗竖细、方正厚重，棱角凌厉，全无传统书法的婉转提按，字形如同漆刷涂刻于木版之上，质朴古拙、金石气韵十足。这种字体初看笨拙怪异，不符合当时主流审美，被正统文人斥为离经叛道，金农却自信十足，称此乃古今未有之新法，是自己悟得的笔墨真意。



《古佛图轴》
金农，1760年

其画作风格，同样跳出了正统框架。“四王”山水追求繁复皴染、层层叠叠，力求复刻古山水的精致意境。金农偏爱梅、竹、蔬果、佛像，构图极简、笔墨洗练，造型略带稚拙变形，不追求写实逼真，也不做繁复渲染。他笔下的梅花枝干疏硬、花影疏淡，自带清冷孤高的气质。更具突破性的是，他打破了“题跋仅为点缀”的传统，偏爱在画面留白处题写长诗、落款长跋，让诗文、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相互补足、共生出彩，彻底重构了传统国画的构图逻辑。



漆书「素心即事」五言联
金农

除此之外，金农彻底打破了文人画“避世俗、远烟火”的清高执念。

正统文人画多偏爱山水、幽兰等清雅题材，标榜超凡脱俗。而萝卜、枇杷、石榴等市井寻常蔬果，皆是他画中的常客。他坦然将人间烟火融入文人笔墨，消解了传统国画的高冷疏离。更难得的是，在世人“君子不言利”的传统认知中，他坦然接受画作的商品属性，凭笔墨养家糊口，不矫揉、不伪饰，这份坦荡本身就是对传统文人桎梏的反叛。

如果说金农的“怪”，是书卷气十足的清古淡泊、静水流深；那么其入室弟子罗聘的“怪”，则是鲜活辛辣、直击俗世的大胆张扬。作为扬州八怪中年纪最小的一位，罗聘二十四岁拜入古稀之年的金农门下，是实打实的忘年师徒。金农晚年体弱，诸多传世作品皆由罗聘代笔，二人笔墨气息相通，却各自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艺术道路。

罗聘最惊世骇俗的代表作，便是一套《鬼趣图》，堪称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绝版奇葩。清代画坛唯有山水、花鸟、人物算得上正统题材，鬼怪题材素来被视为旁门左道，难登大雅之堂。罗聘却逆势而为，绘就八幅鬼趣长卷，画中高矮肥瘦、形态各异的鬼魅或蹒跚独行或争执拉扯或窃窃私语，百态尽显、栩栩如生。他还戏言自己天生碧眼，能见常人不见的鬼魅，直言“凡有人处皆有鬼”。

所谓画鬼，从来不为猎奇。正如后世齐白石点评：罗聘画鬼，实则骂尽世间俗人。画中鬼魅的贪婪、谄媚、倾轧、虚伪，皆是乾隆盛世之下，官场与市井众生相的真实投射。正统绘画讲求温柔敦厚、哀而不伤，从不直白针砭现实。罗聘却以荒诞鬼魅为外壳，暗藏辛辣讽刺，将世间冷暖、人性百态尽数纳入画中，画风新奇、立意深刻，作品一经传入京城，便轰动文坛，令达官贵人观之动容、暗自深思。



《鬼趣图》
罗聘

除却诡谲的鬼画，罗聘的画功全面且精妙，山水、人物、佛像、梅花无一不精。他承袭

金农画梅的技法，却跳出师门框架：金农梅花简淡清冷、孤高绝尘，罗聘梅花笔墨厚重、偶施淡彩，明艳雅致、烟火气十足。他还热衷尝试各类新奇技法，指头作画、筷子代笔、左手挥毫，不断突破笔墨定式，拒绝被传统程式束缚。金农离世后，罗聘悉心整理刊刻老师遗稿，保全其诗文笔墨传世，成为艺术史上一段动人的师徒佳话。



《山水花卉册》
罗聘

纵观二人的艺术追求，与正统“四王”画派形成了极致反差。正统画派以摹古为核心，作画以求“无错”为准则，坚守千年不变的古法范式，服务于精英阶层的传统审美，重在修身自娱、复刻经典。而金农、罗聘师徒，秉持“师古不泥古”的理念，深耕传统笔墨功底，却绝不做古法的复印机。他们主张绘画随心、笔墨抒情，打破题材桎梏，兼容文人雅韵与市井烟火，让绘画不再是小众文人的修身游戏，而是可抒情、可写实、可讽世、可流通的大众艺术，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

在当时保守的画坛舆论中，二人的风格被斥为怪异荒诞、离经叛道。但正是这份不随波逐流的叛逆，打破了清代画坛一味摹古的沉闷僵局。金农以古拙笔墨挣脱秀雅桎梏，为传统国画注入金石古意；罗聘以小众题材拓宽绘画边界，赋予笔墨现实温度与讽刺力量。一静一动、一雅一俗、一古一今，师徒二人互为映衬，构建出独树一帜的艺术风貌。

时至今日，再赏金农的漆书古梅、观罗聘的鬼魅百态，依旧能感受到穿越百年的鲜活生命力。他们用笔墨证明，艺术的终极奥义从不是复刻古人、循规蹈矩，而是抒写自我、关照时代。正是这对不肯随俗的“非主流师徒”，为清代僵化的画坛撕开一道缺口，也为后世海派绘画、近现代文人画的革新，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

桂林影像中的在地性与物质记忆研究

吴毅强



凭借独一无二的喀斯特峰林与水系地貌，桂林山水长期是国内山水摄影的经典创作题材。但多数桂林山水摄影停留在景观美学浅层表达，以标准化构图与光影复刻视觉符号，创作模式单一、媒介趋同，缺乏对地域深层特质、时间积淀与本土生命经验的挖掘，仅完成表层记录，未构建桂林本土影像叙事体系与艺术语言。

伴随当代艺术媒介转向，摄影逐渐摆脱单一纪实功能与表层审美，愈发强调媒介物质性、地方在场性与时间叙事性融合。在此语境下，在地性是创作者、艺术媒介与地域环境共生生成的创作体系。本土摄影师赵杰扎根桂林，以本土身体经验为基础，通过媒介实验打破数字摄影扁平化、无时间性、可复制化的局限。其《半山半水》《穿岩》两组作品分别从水系时空结构与岩壁地质肌理切入，将桂林山水自然逻辑转化为影像生成逻辑，推动桂林山水摄影从“景观再现”升级为“在地生成”，具备重要的当代摄影研究价值与示范意义。

地域经验：桂林山水摄影的知觉基底

艺术创作的在地性根植于创作者长期浸润的地域生存体验。不同于外来创作者的远距离审美观看，赵杰成长于桂林喀斯特环境，山

水是融入成长与身体感知的日常经验。桂林山水特有的二元空间结构——山体恒久坚硬、流水柔软易逝，水上鲜活流动、水下静谧沉滞，形成强烈视觉反差与知觉张力，构成其创作最原初的知觉图式。

这种本土经验塑造了差异化在地认知。现有研究中，在地性常被狭义理解为本土题材、风物与文化的直观呈现，但赵杰的实践表明，摄影的在地性是媒介与地方双向生成的动态关系，摄影是回应、转译地域特质时空的主动媒介。基于此，其创作确立核心方向：摒弃通用山水摄影范式，依托桂林独有地理结构与时间特质，探索适配桂林山水的专属成像方式，让影像从“关于桂林的图像”转为“属于桂林的图像”。

媒介实验：两组作品的时间叙事与物质表达

第一组《半山半水》：湿版工艺的时空考古与记忆重构



半山半水 赵杰 202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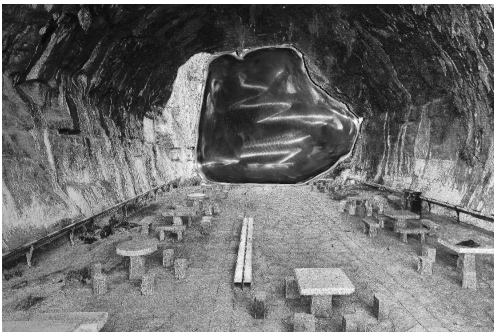
《半山半水》系列围绕桂林山水“山水相依、水分双层”的空间特征，搭建“山、水”二元叙事结构，借助湿版古典摄影工艺，完成山水时间记忆的考古式重构。

山体创作中，创作者比对晚清、民国漓江老照片发现，桂林喀

斯特山体百年间基本稳定，山脚人居与社会景观持续更新，形成“山川恒存、世事更迭”的时空关系。为呈现这一辩证关系，创作者选用湿版玻璃工艺创作，该工艺作为早期摄影媒介，可随光照改变切换正像负像。创作者结合灯箱优化展陈，作品常态呈现山体负像，灯光介入后正像显现。这一观看机制隐喻自然山水永恒在场，以及人类认知的阶段性局限，为静态山体赋予厚重历史时间维度。

水体部分，创作者采用半水下拍摄，捕捉桂林不同季节、水域的双层水景，水上呈现当下流动时空，水下承载沉积过往记忆，天然构建时空分裂的视觉结构。为规避数字摄影画面干净、规整、可无限复制、无创作痕创作者将数码素材二次翻制为湿版影像，人为晃动药液形成不规则痕迹，这些偶然痕迹复刻了人类记忆的真实特征。相较于数字摄影的瞬时性，湿版工艺的手工性、偶然性与延时性，让影像成为承载创作过程与记忆流变的物质载体，重构了桂林山水的集体与个体记忆。

第二组《穿岩》：综合材料的地质肌理与时空交织



穿岩 赵杰 2025

若《半山半水》侧重在影像内容叠加时间维度，《穿岩》则实现了影像媒介本身的时间物化，将桂林溶洞的地质时间与肌理转化为

可触摸的影像物质本体。桂林溶洞岩壁经亿万年水溶形成独特地质形态，浓缩自然演化时间。创作者突破传统摄影逻辑，让影像本身具备岩石的物质属性与地质时间，以铝板为基底，堆积 UV 油墨，叠加颜料控制墨层形成立体起伏，侧光下生成丰富光影，构建微缩喀斯特地质剖面，打破传统摄影平面局限。



穿岩 赵杰 2025

手工打磨是《穿岩》表达在地精神的核心，创作者借鉴远古磨制石器方式磨蚀固化油墨，打磨区域裸露铝板金属光泽，部分可倒映当代桂林景观，远古地质、先民手工、现代都市时空交织，呈现桂林“古地貌承载新城市”的地域特征，完成古今时间对话融合。

理论建构：山水摄影在地性的双重维度

基于两组作品实践，赵杰重构山水摄影在地性双重内涵，突破对在地性的单一认知，形成“内容在地 + 媒介在地”创作体系。

第一，内容层面的在地性：创作素材与灵感均源自桂林地域风物与本土经验，所有视觉特质都是桂林喀斯特独有，创作者以亲历者身份记录与本土土地联结的生命感知，影像扎根桂林语境，具备地域专属属性。

第二，媒介层面的在地性，是创作核心创新：创作者实现地域地理逻辑与影像媒介逻辑同构。桂林喀斯特地貌以“侵蚀与堆积”

为核心地质运动，《穿岩》的油墨堆积与打磨正是对该运动的艺术转译，复刻自然塑造的时间规律；桂林水系双层共存的空间结构，对应《半山半水》虚实交织的影像结构，该方式让自然地质逻辑成为影像生成逻辑，实现媒介与地域深度共生。

创作价值：摄影的物质转向与时间的可触性

传统摄影理论强调瞬时性与非物质性，忽视摄影媒介的物质属性与过程价值。赵杰的创作推动山水摄影物质性转向，证明摄影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内容，更在于媒介本身承载的时间痕迹与集体记忆。

湿版玻璃的通透肌理、药液流动的偶然痕迹、UV 油墨的立体堆积、铝板金属的反光质感、手工打磨磨损痕迹，不再是影像附属载体，而是影像本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作品中，时间不再是被冻结的单一瞬间，而是堆积沉淀打磨的厚度时间。创作中每一次药液晃动、油墨叠加、砂纸打磨，都是时间物质化的过程，最终呈现的影像是可见可触的时间断面，而非虚拟光影图像。

这一创作理念重塑了山水摄影的审美维度。传统山水摄影仅提供浅层视觉审美，赵杰的在地摄影构建了时空与物质结合的综合审美体系，让观者可触摸桂林山水亿万年地质变迁、百年历史更迭与当下都市流变，实现地域记忆的永久性物质留存。

结语

在山水摄影普遍陷入景观同质化创作的困境下，赵杰以桂林喀斯特地域特质为根基，通过《半山半水》《穿岩》两组实验摄影作品，完成桂林山水摄影的在地化革新。其创作跳出传统风景摄影机械复刻思维，从本土身体经验出发，结合湿版工艺、综合材料打磨等多元媒介实验，构建了“内容在地、媒介在地”的双重在地性理论体系。

赵杰的创作证明，优秀地域摄影并非简单复刻地方风景，而是以适配地域自然逻辑的媒介语言，让影像扎根土地、承载时间、留存记忆。其艺术实践丰富了桂林山水摄影的创作语言与表达边界，也为当代中国地域摄影的本土化、物质化、深度化发展提供了参考范式。

《汪曾祺年谱》有小疵

董国和

徐强在《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后记中说："对于谱中难免存在的错失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他的恳请既然如此心诚，我不揣冒昧，在这里指出它的两处小疵。

先说汪曾祺刊于《北京文艺》1957 年第 6 期的《来函照登》。此函是因汪曾祺在《国子监》文中之误："拙文《国子监》（刊于《北京文艺》三月号）中说我的朋友老董曾经'伺候'过翁同龢、王垿、陆润庠等祭酒。前日金受申同志来谈，翁同龢在一八九七年已经入阁（协办大学士），距今已六十年，作祭酒自刊更在以前，老董今年七十三，断无亲见翁同龢为祭酒之理……《国子监》系急就率成，不妥之处谅当尚多，容他日逐一订正。"

汪曾祺此信写于 1957 年五月十四日，但是，此后他因错划为"另类"，待他"改正"后又因时过多年，订正就未能兑现。由此可证，《汪曾祺全集》也失收此函。汪曾祺在《随遇而安》中说自己因不记日记，他有些事记得并不准确，当非过谦之语。但《国子监》以后虽然有了删改，对此却没有"逐一订正"。这除了汪曾祺有可能忘记了此事之外，还有可能是他自认为无错，也就不想改了。

如果对"世代"有宽泛的理解，在当差者中汪曾祺就不专指老董一人，其中还应当包括老董的前辈；明乎此，就明白老董即使没"侍候"过翁同龢，还有"陆润庠、王垿等祭酒"，他们与翁同龢不是同一年代人，"距今已六十年"就不是问题了。如果照此来理解，汪曾祺就无错可改，对当年所说的"订正"，当然就可以不予理睬。

汪曾祺说："我写《国子监》大概一九五四年"。这在年谱中已有记载，但徐强百密一疏，如果他再查找到《来函照登》，就可无此遗憾。其二是何人从废稿中发现陈登科《活人塘》的问题，遗憾也

与之相同。徐强在年谱中只采用邓友梅之说，未再细查他人之文。邓友梅之说是：“《说说唱唱》第10、11期连载安徽作家陈登科《活人塘》。这篇著名的作品是汪曾祺从不拟采用、准备丢弃的来稿中发现后认为可用，提交给主编赵树理的。”这段记述出于1950年10月，其中失误有两处。

汪曾祺在《赵树理同志二三事》中，称赵为副主编，这有文可查，也符合事实，此错太不该。关于发现废稿之事，按邓友梅文《两谈汪曾祺》中所说：对于汪曾祺为什么和怎么去那里开矿的往事，已没有人记得。只记得那篇稿子涂抹很乱，满纸错别字外加自造怪字如天书一般。但汪曾祺却以超常的毅力读完了，还认为是篇不可多得的佳作！他就花工夫改了些勉强能辨认的错别字，至于陈登科那个自造的“趴”字，抽了半盒烟也没认出来。幸好遇上高人康濯，终于猜出其义。

康濯在《情忆开国之初——最后送别丁玲同志》中，则另有说法：“田间谈起了陈登科。他写的《活人塘》寄给《说说唱唱》的赵树理，老赵看了好几遍，又求我们几个编委一定要再看一看。田间看了，说好，又说还不成文。错别字太多，赵树理给改了；有些用自造的符号代替的字，老赵也猜出了几个，可还有一些没猜出。”（《人民文学》1986年第4期）但康 濯最后说，“趴”字是由他猜出，还说写信询问过陈登科，并得到证实。康濯当年是大众文学研究会的编委，级别比邓友梅高，而且其文出之在先，自然可信度更大。而年谱无视于康文，其误即出于此。

年谱之作，形同修史，理应如同班固所言：“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但这又很难做到，因为书山刊海，修谱者难免疏漏。如非妄猜，徐强将救活《活人塘》之功，只引用邓友梅所说，恐怕就是未查到康濯之文。

当然，谱主因无日记，多年间又为文学中边缘中人，徐强在材料少之又少的情况，能修成如此详细周密的年谱，谈何容易。因此，年谱虽有此小疵，却不影响它的成就与价值。（作者为退休人员）

读书写作，收藏精彩

汤云明

读书、写作 30 多年来，除了发表文章，获得图书和报刊杂志、奖状和稿费的快乐和满足以外，也有很多写作之外的间接获得和收藏。总结起来，这些收获主要是结交天下文友，获得广博知识，收藏邮票、图书、报刊，让我更热爱自然、旅游和生活。

很多报刊的编辑也是作家、诗人，我通过投稿和加入作者群、读书群，认识了全国各地的作家、作者和编辑，即使窝居在西南边陲的小县城里，也能及时知晓和了解全国各地的文坛动态和文学活动。

写作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获得无限广阔的知识面，这些知识包括地名、人物、历史、自然和文化，并且越来越延展和宽广。认识了某个刊物，其实就是认识这个刊物所在地方的风土人情。

我整理的投稿电子邮箱通讯录里，都会标注每个报刊所在的省市（县区）名，时间一长，哪个刊物在哪个省区市就明白于心，特别是一些县区、乡镇的名字，如果不是因为写作，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听过，更不会与我有任何关联。如果正好那些地方的刊物发表了我的文章，并且寄来样刊收藏，就会从邮寄地址和阅读刊物增加了对这个地方的认识和印象。我通过一本叫《广阔的天地》的杂志，知道了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居然有一个叫“广阔天地”的乡镇。

为了写作，特别是写地域性较强的征文，还得搜索和查阅大量的资料，甚至会为一个字词是否恰当而推敲不定。时间一长，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自然文化、甚至哪个地方出过哪些名人都有所知晓。有意思的是，很多刊物就直接用这个地方的地名、人物、山河、历史遗迹、特色花草树木来命名，既好记，又有代表性、知识性。

直接以地名作刊物名称的就有《香格里拉》《大理》《岳西》；以人物作刊物名称的如《丁玲文学》《曹雪芹研究》《赵朴初研究》；以

历史遗迹作刊物名称的如《长坂坡》《赤壁》《长城》；以花草树木来命名的有《牡丹》《参花》《含笑花》；以中国地理方位命名的刊物有《边疆文学》《西部》《北方作家》《南方文学》《西北文学》《中原》《东方文学》等。

以山河湖海和省市名来命名刊物的就更普遍了，也是最多的一类，以省市命名的刊物多数是各级文联、作协主办的刊物，如《四川文学》《山东文学》《广州文艺》《厦门文学》不胜枚举，在我的邮箱通讯录里，以运河、珠江、泰山、秦岭、黄海来命名的刊物就有好几个。又如《青海湖》《太湖》《滇池》《西湖》就是以湖来命名。在黄河、长江流域经过省市区，以黄河来命名的刊物就有《黄河》《黄河文学》《黄河文艺》《黄河三峡文艺》等，以长江来命名和刊物就有《长江丛刊》《长江文艺》《长江诗刊》等。

写作还促进了收藏和学习。这些年，我收藏了很多文友之间交换、赠送和发表我文章的图书、报刊样本，到了以书为床、满屋书香的程度。还收藏着一些报纸杂志的创刊号、终刊（停刊）号、纪念号、改版号等，很是珍贵。我还从编辑部寄来的邮件中得到并收藏了很多纪念邮票、特种邮票、小型张、明信片、以及最新发行的普通邮票和纪念封。这些收藏丰富了我的生活，增长了我知识和阅历。

我还收藏了很多这几十年来报刊编辑、外地文友写给我的信、用稿证明等，电脑普及以前，他们都是亲笔手写，即使退稿，也会说明原因和要求，与修改过的文章一起寄来，并给予鼓励和认可。电脑普及以后，大部分编辑会用电脑打印邮件，但通常会有落款或公章，对于个人来说，仍然有收藏价值。

人们通常把钻心读书、研究和写作称为做学问，而每个走上读书和写作道路的人，都会沉迷其中而乐此不疲。并且路子越走越宽广，眼界越来越开阔，题材和思路越来越多，越来越热爱旅游和生活，关心自己的祖国和它的历史文化、锦绣河山，也让自己短暂而又漫长的人生越来越精彩。（作者为昆明市晋宁区作协副主席）

风骨与温情的精神肖像

季 米

吴昕孺的《书中自有人如玉》，并非对“颜如玉”的浪漫怀想，而是将“玉”化作人格的象征，展开一场跨越古今的精神对话。作者以温润之笔，拾掇时光长河中散落的人格光点，无论是文人、画家、隐士，还是寻常贤者，将他们的风骨与温情，凝铸为一幅幅饱满而立体的精神肖像。掩卷之际，仿佛穿行于墨香与岁月之间，触碰到人性深处那份不灭的光辉。

书中选材看似随兴，实则藏有深意。从两千年前谪居长沙的贾谊，到梓园中与草木虫鸟为邻的韩少功；从寒江独钓的柳宗元，到“亦诗亦僧亦梅花”的八指头陀；从文坛大家钟叔河、朱正、黄永玉，到诗人流沙河、李少君；从痴迷藏书的彭国梁，到曾执编《书屋》的周实，这些名字宛若温玉，默默承接时代掷下的冷硬铁石。他们身份各异，却皆以文字或思想立身。作者不耽于宏大叙事，而将目光投向日常交往中的细微片刻：韩少功笑言草木才是梓园主人，谢宗玉有身上挥之不去的“孩子气”……这些淡笔勾勒，恰如工笔细描，于平淡处见性情，让灵魂的模样在细节中悄然浮现。

最动人的，是文字间流淌的精神共鸣与自我映照。本书的写作，本身即是一场心灵的修行。作者怀揣对人性的悲悯与对美好的敬畏，潜入每一个人物的精神疆域。写柳宗元，不重其贬谪之苦，而取其“以愚待世”的澹泊智慧；写周敦颐，避谈《爱莲说》，转而描绘月岩少年“将月亮磨成铜镜”的孤高心事；写八指头陀，不强调僧侣清寂，而凸显其“身似孤云无定踪”的诗性漂泊。在此过程中，作者与笔下之人互为镜鉴。写他人的风骨，亦在抒发自我的怀抱；记他人的故事，亦完成一次次精神的跋涉与突围。诚如书中所言：写别人，往往也是在写自己。每一次对他人灵魂的凝望，都是对自身生命版图的悄然拓展。

作为人文随笔，本书兼有故事的温度与思想的深度，文采斐然却不失见识。吴昕孺的文字洗练含蓄，富于诗质，论述从容而藏锋哲思，兼具学者的审慎与诗人的敏锐。湖湘文化中的坚韧与灵秀，亦悄然浸润于字里行间，使地域气质与时代精神得以交融。在功名喧嚣的今日，这部作品宛若一座静谧的精神灯塔，照亮那些始终未曾妥协的高洁人格。

书籍之珍贵，不止于知识的传递，更在于人格光辉的传承；阅读之意义，不仅为完善自我，亦是为在他人的生命叙事中，照见心灵的共鸣。当我们与书中这些“如玉”之人相遇，何尝不是与内心向往的某个自己重逢？

在一切求快的时代，此书如一帖清心剂，让人于纷扰中沉静回望，重新辨认何为真正的美好。那些遗世独立的风骨、磊落光明的灵魂、温润内敛的品格，从未随时光褪色，反而在岁月积淀中愈显通透璀璨。阅读此书，恰似一次深长的精神呼吸，提醒我们：在纷繁的世界里，始终可以守护一片内心的清澈与深情。（作者为浙江省衢州市公司职员）

《东莞传》

詹谷丰、李炳球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 年 8 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K296.53/214



本书是一本城市传记，重点阐述东莞的历史文化、经济建设、风俗民情。全书分为三个篇章：历史文化篇，重点介绍东莞的广府文化、粤曲、粤剧，袁崇焕、罗亭信、伦明等历史文化名人以及虎门炮台、袁崇焕纪念园、可园等名胜古迹；经济建设篇，着重介绍东莞世界制造业之都的前世今生，讲述东莞在制造业转型升级、开展对外经济、科学技术创新、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巨大成就；风俗民情篇，重点介绍东莞木鱼歌、东莞木偶戏、百子论文、东莞龙舟竞渡、莞邑醒狮艺术、樟木头客家麒麟艺术等。该书通过风趣的语言和翔实的史料向读者全面展现东莞这座魅力城市的方方面面。

西方视野下古代中国文化的别样探寻

方怀银

中国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对于历史的研究，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选取的研究对象，都取决于其对历史研究的功能、责任与目的等观念的认知。因此，历史书写总是呈现多样性与丰富性。牛津大学中国艺术与考古学教授杰西卡·罗森致力于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过去，推进文明交流与互鉴，别具匠心选择墓葬作为研究对象，写成《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展现古代中国社会生活图景，建构起中国文化与文明传承的范式。

要理解并读懂万年中华文化，墓葬是一个重要的窗口。罗森很早就注意到黄土的地质特征在中国墓葬传统中所起到的作用。她从全球视角观察，对比埃及金字塔、西亚大型陵墓等，发现黄土造就了中国厚葬传统和来世观念，并延续至 20 世纪。陈寅恪就十分注意利用新出文物以为考史之用，曾对学生说：“墓志铭很重要，即使是妇女或非名人的，亦可作为史料参考”。罗森基于这一发现，写就了此书。

书中选取的 12 座墓葬，所涉年代始于公元前 3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止于秦代。从良渚大墓到陶寺首领墓葬，从殷墟亚长墓到三星堆，从曾侯乙墓到秦始皇陵兵马俑，有尊卑有别、绵延有序的权贵墓地，有的从属于陵墓、无人安葬于此、但帝王的威权和气势扑面而来。确切来说，墓葬的数量其实是 11 座，但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器、玉器和金器，和墓葬一样，也是独特习俗和信仰的呈现，属于特殊埋葬。在严谨的考古学分析中，它们都可以被

归为同类。罗森从 1975 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来中国考察，踏遍了中国大部分省份的重要考古遗址和博物馆，研究中国的古代历史和出土文物，研读墓葬遗址的考古报告，获取写作素材。

罗森不是简单地罗列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等，而是运用跨文化视野与严谨考据，从更宏观的视角解释墓葬，将墓葬转化为文明对话的桥梁，揭示这些遗址体现出的非凡创造性，以及中国在世界文明早期历史中的独特性。进而解码古代中国的政治演进与精神信仰，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全新维度。因此书中的很多观点带给我们新的启示。诸如：黄土与中国北方陶器传统密切相关，也是领先世界的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前提；墓葬和祭祀仪式中盛装食物贡品的器皿非常丰富，食物被赋予很高的地位，食物与宴饮仪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通过考证玉琮的器物类型，推测出玉文化从良渚、陶寺、石峁到安阳的交流路径，反映出各区域文化间的联通与交流从未中断，体现了中华文明宏观上的连续性。

书中所涉及的墓葬多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和新收获。很多遗址为公众所熟知，许多人甚至实地参观过其中的一些。但不同于大众的走马观花，罗森以广博的知识、独到的眼光、优美的语言、不同时空与视角的切换，将沉埋于黄土之下的墓葬激活，找到它们在历史演进中的价值。从华屋山丘、物的言语、文化交融、马上天下四个部分，将 12 个墓葬逐一解构，良渚的玉之神秘，陶寺的狼藉盛宴，蚌埠双墩的南方之圆，秦始皇陵的永恒军队……展现了考古学与美术史在历史写作中的力量。

本书选取的长达三千年的时间段，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第一个段落，是国家文明的关键时段。对于认识中国文明，这是最值得浓墨重彩、洞幽察微的段落。罗森以文字书写勾勒中国的国家文明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文明的同步、独到，以及跨越欧亚大陆的文化交融的生动历史，带领读者来了一场壮游。（作者为安徽省邮政分公司员工）

守与走：一部侨乡百年心灵史

刘学正

海风裹挟着咸涩的水汽，掠过福建长乐、广东台山的古村巷陌，吹向大洋彼岸的唐人街，将百年侨民的悲欢离合，铺展在钱利娜的长篇非虚构作品《两地秋》。作者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为根基，用诗人的细腻笔触为丝线，串联起一个个平凡侨民的命运轨迹，在个体的悲欢沉浮中，勾勒出一部浓缩的中国侨乡百年心灵史诗。背井离乡的艰难，固守家园的深情，海外谋生的不易，刻进骨血里的亲情执念，都写在了字里行间。

“男人漂洋过海去打工，女人守在家里带孩子照看老人。这就是我们的一辈子。”朴素而沉重的话语，道尽了侨乡女性的宿命，也拉开了“两地分离”的序幕，成为贯穿全书的情感底色。被称作“云上的妻子”的女性们，背负起家庭的重担，扛起了无尽的守望。常年的孤独让母亲习惯了对着澡盆里的影子自言自语，这是她消解寂寞的方式；当海外归来的“我”站在她面前，她急切地想把十一年来没说够的话一次性补上，积攒已久的思念，尽数倾泻，令人动容。

在通讯不便的年代，维系两地亲情的，是一张张跨越重洋的“银信”。薄薄的银信，捎来养家糊口的金钱，也承载着滚烫的情感。李维诚到达古巴后，靠着搓衣板、熨斗、煤炉三样工具白手起家，在异国的底层艰难挣扎，银信是他生存的证明，是亲情的纽带。“一封封银信，让蝼蚁一般讨生活又时时两地相望的亲人，在同一轮明月里相互照见。”而粤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则成为侨民消解乡愁的精神寄托，李维诚用“咿咿呀呀”的吟唱慰藉孤独。一曲终了，唱腔里的悲欢离合，是他和故乡、和过去唯一的连接，让漂泊的灵魂得以短暂安放。

如果说银信是侨乡跨洋纽带的物质载体，那么遍布村庄的祠堂与神明信仰，则是游子精神上的“锚”。书中对“五灵公”信仰的书

写尤为动人，这一源自福州的乡土神祇，成为人们在异国站稳脚跟后回望故土的精神坐标。村民年年请神下山、送神归位，仪式中既有对祖先的追怀，也有对远隔重洋的亲人的祝祷。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信仰在这里不是虚妄的寄托，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策略：它让离散的人们在精神上依然属于同一个共同体，让“两地”在香火缭绕中重新合为“一家”。

《两地秋》始终把目光落在“人”身上，不渲染悲情，只是平静地呈现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邓珍珠抚养丈夫从国外带回来的孩子，而孩子的生母是菲律宾人，在当时的乡土环境里，“鬼佬”一类的说法如同无形的阴影，让整个家庭长期承受流言蜚语。邓珍珠以一个普通女性的坚韧，对抗着世俗的狭隘，道出了侨乡家庭在跨国血缘、地域偏见与传统伦理交织下的处境。漂泊半生的常永真，回望过往经历时，万般滋味在心头。他见过太多人远赴异国打拼，有人衣锦还乡，有人漂泊无依，有人建起新房却难得居住，有人倾尽所有仍难抵命运颠簸。他的感慨，折射出一代侨乡男子在出走与回归之间的彷徨。

《两地秋》不仅记录了苦难，更记录了尊严。书里的主人公们，无论是为了家庭默默忍受离别的妻子，还是在大洋彼岸辛苦打拼的丈夫，他们身上都闪耀着一种朴素的微光。他们追寻生活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但也收获了属于奋斗者的幸福。诚如书中所言：“无论老天爷怎么对我，我都打算搏一搏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支撑一代代侨乡人漂洋过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所谓“两地秋”，秋是收获，亦是萧瑟；是此处月明，亦是彼岸霜寒。《两地秋》既书写了淘金者在异国打拼的艰辛，也记录了留守亲人的日夜期盼；既探寻了原乡人同宗同源的文化根脉，也直面了迁徙带来的人性抉择。在世界变成“地球村”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一段段横跨大洋的家族史时，更能理解什么是文化的根脉，什么是家国的牵绊。无论我们走得多远，故乡永远是心中的根，乡愁始终如秋日的寒蝉，在每一个寂静的夜里，于心底发出回响。（作者为电视媒体工作者）

从“父母之命”到“灵魂伴侣”

任蓉华

1781 年夏，沈复和妻子陈芸在苏州沧浪亭畔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为欢愉的时光。翻书论古，品月评花，二人皆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百余年后，这对夫妇所代表的婚姻形态却被贴上了“包办婚姻”的标签，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猛烈抨击的对象。而对于今人来说，古人的婚姻生活仍蒙着一层厚重的面纱，常视其为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礼法束缚的无爱结合。

历史学者卢苇菁的《执子之手：清代的婚姻与伉俪之情》，依托士人日记、夫妇书信、诗文手稿等丰富史料，以深刻的人文洞察，呈现了清代士人夫妇在礼教缝隙间用心经营的温情。作者致力于还原传统社会中“情”与“礼”的微妙平衡：纵使囿于包办婚姻的框架，依旧有无数双手紧紧相握，书写着独属中国人的情感史诗。

清代士人阶层虽无婚前恋爱的自由，却另辟蹊径，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婚后恋爱”艺术。婚姻之于他们，绝非爱情的坟墓，恰恰是情感的起点。新婚之夜的催妆诗、却扇诗，早已超脱单纯的礼仪过场，成为才子佳人彼此试探、展露才情、缔结精神契合的媒介。灯下共砚、联句品茶的日常琐碎，构成了他们情感世界的坚实基石。这种情感兼具双重特质：既有“浪漫之爱”的炽热，如洪昇和表妹黄兰次定亲后，因离别而夜不成寐，写下“虽有合欢被，独眠为谁设”的诗句，直白袒露对婚姻的深切向往；亦有“伴侣之爱”的深沉，学者郝懿行与妻子王照圆成婚后，视彼此相遇为“奇迹”，感叹二人“理之所无、情之所有”，道尽灵魂相契的万般深情。

尤为动人者，是书中对男性忠贞观念的深度挖掘。在传统认知中，“贞节”似乎是女性的专属美德，作者却让我们窥见了清代的

“义夫”群像：尤侗感念糟糠之妻的共苦之情，终身不纳妾；孙星衍痛失佳偶后誓不再娶，甚至将亡妻旧居命名为“长俪阁”，以此寄托永久的哀思。基于深情而非礼教规训的男性忠贞，标志着清代夫妻关系中一种新的道德自觉。即便在男权主导的社会架构下，女性也绝非仅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可以是丈夫精神上的知己，成为激发男性道德升华的重要力量。

作者既不回避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圆满，也不讳言婚姻中的冲突、背叛及挣扎。当才情遭遇薄幸，当幻想撞上背叛，闺秀内心的愤懑便如决堤之水。女画家陈蕴莲的命运令人唏嘘，她曾割肉疗夫、卖画持家，却在丈夫得志后惨遭背弃。但她未选择沉默，而是以诗画为剑，将痛苦和愤怒化作血泪交织的自传《自题八图》。如此愤怒，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控诉，更是对“佳偶”理想破灭的深刻反思，彰显了清代女性在情感困境中觉醒的主体意识。

此外，书中对妻妾关系的剖析也颇具深度。在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复杂生态中，作者没有简单地将其描绘为妻妾争宠的宫斗剧，而是展示了其中微妙的协作和情感流动。有的妻子因无子而主动为夫纳妾，视妾生子如己出，如谢氏、殷氏共同抚育焦循的佳话；也有妾在尊严受损时毅然求去，如石韫玉之妾曹氏的决绝。即使在等级森严的制度桎梏下，人与人之间仍藏着复杂的情感博弈，闪耀着动人的人性光辉。

礼法是时代写下的框架，情意却是人心里长出的血肉。在清代士人夫妇的诗文信笺中，我们读到的何止是爱怨交织的故事，更是中国人在规训中求索圆满的生命智慧。婚姻的形式随岁月更迭，而对“执子之手”的向往、对灵魂共鸣的渴求，早已穿透百年尘埃，从未冷却。这份对真挚情感的执着追寻，终究是刻在中国人灵魂深处，滚烫且坚韧的一抹暖色。（作者为企业质量工程师）

卡夫卡咖啡馆·莞：以电影文学升级城市阅读

穆 肃

卡夫卡咖啡馆·莞开业于2011年，至今已营业了14年多，是东莞市首家电影主题咖啡馆，也是一家定位于电影艺术与文学的主题性城市阅读驿站。卡夫卡左侧为市电影院、右侧为文化周末剧场、一百米范围内有美术馆和图书馆各一座，是莞城的重要文化配套与文化空间之一。

卡夫卡分为三层楼，室内总面积约220平方，其中对外营业空间为160平方左右。空间设计深度契合电影主题：墙面点缀经典电影海报与导演语录，角落陈列复古胶片放映机模型，书架区以电影史、影视理论类书籍为核心，搭配现当代文学著作，连桌椅摆放都借鉴了影院观影动线，让每一位访客都能沉浸式感受“在咖啡馆里读懂电影”的独特氛围。

运营管理的主要做法

一、精准定位，打造电影艺术交流高地。自成立之初，卡夫卡便确立“电影主题文化空间”的清晰定位，持续邀请影视行业重磅创作者落地交流活动，为东莞影迷搭建与行业大咖对话的桥梁。曾先后迎来纪录片导演范俭（代表作《摇摇晃晃的人间》）、电影美术指导李淼（《唐山大地震》《唐人街探案》视觉总监）、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得主周浩（《龙哥》《高三》导演）等知名影人，更邀请到导演邱炯炯举办作品展映会，通过影片放映、主创分享、观众问答等形式，让东莞市民近距离接触影视创作核心，累计吸引超万人次参与，成为本地影视文化交流的标志性平台。

二、多元融合，构建跨界文化生态圈。除电影主题活动外，卡

夫卡还打破业态边界，化身多元化文化聚集地：曾举办作家木凡新书发布会、李培军《东莞城迹》城市文化研讨会、东莞市评论家协会主席柳冬妩作品分享会，让文学与城市记忆在此碰撞；周逸画展、罗和水彩展、刘智伟摄影展等艺术展览轮番登场，为本土艺术家提供展示平台；更曾承办“广东省作家协会与东莞评论家对话”活动，推动省级文学资源与本地文化力量深度对接，年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超 50 场，形成“电影 + 文学 + 艺术”的跨界文化生态。

三、公益赋能，升级城市阅读新场景。2023 年，卡夫卡与莞城图书馆达成深度合作，共建“城市阅读驿站”，并创新提出“电影主题阅读空间”定位——精选 3000 余册书籍，涵盖世界电影史、影视剧本创作、导演研究等专业品类，搭配余华、苏童等现当代作家经典作品，精准匹配资深读者与影视爱好者需求，日均接待阅读访客超 80 人次。

在公益阅读领域，卡夫卡坚持“文化普惠”理念，年均开展公益性读书会近 40 场，每月至少 3 场的活动频率从未间断。其中，“三七读书会”“莞读读书会”等民间阅读小组长期入驻，每年组织书籍推荐、主题共读活动约 20 场，累计覆盖读者超 5000 人；2024 年起，联合东莞市残疾人联合会、东莞文化馆推出“心目影院——听见光影的温度”公益项目，通过专业主持人声情并茂的场景讲解，让视障群体“看见”电影画面，一年内累计举办 18 场活动，服务超 300 名残疾人朋友，用文化温暖特殊群体，获评“东莞年度公益文化项目”提名。

阅读推广的主要特色

一、以清晰定位筑牢差异化优势

卡夫卡始终坚守“电影 + 文学”的特色定位，从空间装修、书籍选品到活动策划，每一个环节都围绕主题展开，避免了公共文化空间“同质化”困境。通过打造辨识度强的文化符号，成功吸引一批稳定的“文化同好”群体，形成了“提到电影主题咖啡馆，就想到卡夫卡”的品牌认知。

二、借力主理人资源激活空间活力。咖啡馆主理人深耕东莞

文化圈多年，凭借自身人脉与资源优势，持续链接影视、文学、艺术领域的优质资源，为活动策划提供了有力支撑。2024 年起，主理人创新传播形式，开设“素人荐书”“卡夫卡的朋友”系列视频栏目——邀请在馆阅读的普通读者出镜，分享自己的阅读故事与书籍推荐理由，内容通过抖音、视频号等平台传播，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超 10 万次，不仅扩大了咖啡馆的社会影响力，更带动了全民阅读氛围的提升，实现了“小空间撬动大文化”的社会效益。

三、以公益属性拓展公共价值。卡夫卡跳出“单纯商业咖啡馆”的定位，主动承担公共文化服务职能，通过共建阅读驿站、开展公益活动，将商业空间转化为“准公共文化场所”。这种“商业 + 公益”的运营模式，既保证了空间的可持续经营，又提升了其社会价值，获得了政府部门、文化机构与市民的多方认可。

社会影响与文化价值

一、影响力辐射，成为城市文化名片。凭借在文化传播领域的持续深耕，2025 年，卡夫卡迎来重要发展节点——人民日报社、广东省作家协会组成联合调研团队，以咖啡馆为样本调研东莞“新大众文艺形态”建设成果。随后，《人民日报》曾报道卡夫卡的运营模式，将其作为东莞新型阅读空间的典型案例推向全国，进一步扩大了东莞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二、获得荣誉与奖项：2017 年，因在影视文化推广领域的突出贡献，被东莞市文化体育旅游局正式授予“东莞（莞城）影视艺术创作基地”称号，成为东莞影视创作与交流的官方指定平台；2024 年，凭借特色化运营模式与公共文化服务成效，成功入选东莞市第二批“·莞”空间联盟成员单位，标志着其正式纳入东莞优质文化空间集群，成为推动城市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2026 年，由莞城图书馆报送的“莞城分馆卡夫卡咖啡馆城市阅读驿站：光影伴书香，打造复合型文化新标杆“，成功入选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 500 个案例名单。成为莞城推动公共文化空间创新促进社会力量参与文旅建设的生动实践。

“寒声暖读”零下30℃的3分钟阅读挑战

王党庆

呼伦贝尔的冬天，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呼出的气结成霜，书页冻得发硬。但在一群人的坚持下，这极寒之地，成了全民阅读的“舞台”。

这一创意之举，为何能走出国门、惊艳世界？

这是呼伦贝尔市图书馆打造的“寒声暖读”3分钟极寒阅读公益行动。项目于2025年12月启动，在全年最冷的月份持续开展33天——鼓励人们在凛冽寒冬中朗读3分钟，每一次完成，就转化为偏远学校的一本图书捐赠。将寒冷化为特色，让阅读成为公益。

这个项目，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2026年度国际营销奖评选中，从全球120余个优秀案例中脱颖而出，荣获第一名，实现了内蒙古自治区在该国际奖项上零的突破，也成为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实践的典型范例。

一、冰雪为媒，把“不可能”变成“新场景”

呼伦贝尔地域辽阔，边境线绵长，冬季漫长严寒，极端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漫长的寒冬和低温风雪，曾让冬季公共文化活动“举步维艰”。广袤的地域造成城乡阅读资源分布不均衡，偏远学校文化资源薄弱；寒冷天气也制约群众出行意愿，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民走进图书馆参与阅读活动的积极性。

但呼伦贝尔市图书馆换了个思路：既然冷是呼伦贝尔最鲜明的标签，为什么不把寒冷变成阅读推广的独特场景？

项目依托内蒙古自治区冰雪那达慕、冰雪英雄会等本地大型文旅活动，在全市14个旗市区布设29个挑战点位，把阅读场景搬到雪原、冰面之上。参与者在零下30℃的户外完成3分钟朗读，嘴边

呼出的白气、书页上凝结的霜花，都成了极具感染力的阅读画面。项目把地域自然特征转化为阅读品牌辨识度，以冰雪为媒，打造独属于北疆的阅读文化 IP。

“为什么是 3 分钟？”项目负责人解释，“3 分钟不长，刚好够读完一首诗、一段散文。门槛低，参与的人就多。我们把‘极寒’和‘3 分钟’绑定，就是要让人感受到：这么冷的天都能读 3 分钟，平时的‘没时间’‘太累了’，其实都不是理由。”

二、从“我读”到“我们送”，一条完整的公益链

“寒声暖读”的核心创新，在于设计了一套公益转化机制：参与者每完成一次 3 分钟极寒阅读挑战，图书馆就代表他，为基层学校投放一本图书。

不同于传统图书馆独立建设分馆、单向输送图书的模式，这个项目让每个参与者都成为公益的践行者——每完成一次极寒阅读，就有一个偏远地区的孩子收到一本书。城市与农牧林区、读者与乡村学生，通过阅读被串联起来。

活动打破公益捐赠单向输送模式，充分调动社会公众的参与感与共情力，构建起“参与阅读、汇聚爱心、图书下沉”的完整公益链条。参与者不再只是公益的旁观者，而是践行者与传播者。这种模式唤起全社会对边疆基层阅读短板的关注，让书香跨越地理距离，为偏远学校送去文化温暖。

三、数字技术，让温暖“可留存”

项目将 NFC 芯片、视频录制、小程序等数字化工具有机融合，为公益阅读活动赋予全新数字体验。参与者完成阅读挑战后，可获得一张 NFC 智能数字明信片，手机轻触卡片，即可回看自己的朗读视频，永久留存专属阅读瞬间。

数字明信片支持社交平台分享传播，形成“现场体验—公益践行—数字留存—社交扩散”的完整传播闭环。即便线下活动结束，参与者依然可以反复回看影像、重温阅读体验，持续扩大项目影响力。数字技术打破了线下活动的时空限制，让极寒中的书香故事持

续传播，以数字化手段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传播半径。

四、一座图书馆的“朋友圈”

“寒声暖读”坚持开门办文化，积极联动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捐赠首批图书；中科数字公司提供 NFC 技术支持；北京人天书店集团持续输送优质读物；各旗市区图书馆及文旅部门联动布点，将其嵌入冰雪旅游线路；20 余名馆员组成跨学科团队，70 余人次志愿者支援现场。通过整合行业资源、汇聚社会爱心，有效补充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拓宽普惠阅读的资金与物资来源。

五、冰天雪地间的书香温度

从牧民到游客，从孩童到长者，从汉语到蒙古语、俄语，3592 位挑战者用朗读汇聚成一股跨越民族、语言与职业的文化暖流，也成为这座城市开放、团结、温暖的生动注脚。活动期间，累计为偏远农牧林区学校捐赠图书 3053 册，惠及 9 所学校；新增读者证 3158 个，到馆量达 25597 人次，较去年同期 12103 人次增长超过 111%。其中，挑战者中游客占 38%、本地居民占 62%；NFC 明信片播放量达 2898 次。目前，“寒声暖读”活动全网传播曝光已累计突破 150 万次。

正如 IFLA 评审委员会在评审报告中指出：“寒声暖读”作为一项简洁却极具实效的公益倡议脱颖而出，它将气候转化为传播的舞台和信息载体。通过结合声音、叙事以及技术（借助 NFC 卡片），创造了一种极具人性化且可供分享的体验，从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一致高度赞扬这项既具备可复制扩展性又极其鼓舞人心的活动。

这个奖项，属于 3592 个在严寒中捧起书本的人。它证明了，文化创新不独属于资源丰沛的大都市，在中国的边陲雪原上同样能诞生震撼世界的创意；民族团结与公共文化服务，既是不同语言在同一片天空下朗读传递的和谐共鸣，也是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温暖循环。

而比奖项更珍贵的，是这片土地上升腾起的文化自信。在极寒的地方，阅读传递着温暖与希望；在中国的边疆，有着走向世界的力量。

书香短讯

张宽路

※6 月 1 日，东莞图书馆在南门开展“六一书香小寄语”活动，吸引了众多小朋友驻足参与。当天少儿分馆还举办家庭教育分享、英文绘本故事会、古风绘扇手工、《粤剧里的科普》等精彩活动。

※2026 年端午假期，东莞图书馆联动全市镇街（园区）分馆、工会分馆及“·莞”空间联盟成员馆，推出航天主题展、名家讲座等“书海泛舟”阅读推广系列活动，吸引 22 万多人次参与。

※6 月 19 日，东莞图书馆图书流动车开进东莞市体育中心广场，参与到 2026“制造精彩 进莞来战”粤超端午嘉年华活动中。

※6 月至 8 月，东莞阅读联盟中海社区老年大学读书会、东莞悦读俱乐部、史海钩沉读书会等 6 家读书会先后举办《东莞 1945·将军密令》沉浸式红色剧本杀等多场活动，吸引上千人次参与。

※2026 年暑假，东莞图书馆举办“2026 东莞动漫之夏”活动，以“三国新演义”为主题，推出了版本源流特展、3D 立体装置展、“诸葛亮的智慧”主题讲座、亲子名著围读会等多种活动。

※2026 年暑假，东莞图书馆启动 2026 年东莞图书馆绘本馆体系暑期绘本活动。本次策划设置了“阅绘小候鸟”专属绘本活动、“绘本奢遇”银龄阅读专场、公益绘本创作课程等系列活动 250 多场次。

※7 月起，作为 2026 年东莞“百千万·莞一夏”青少年儿童暑期公益服务活动的重要内容，东莞图书馆联动镇街分馆开展优质图书服务进村到户、“小候鸟翻阅城市”书香东莞之旅等阅读活动。

※8 月 13 日下午，“高尔基——连接文化世界的桥梁”大湾区联展（东莞站）正式揭幕。本展览由莞佛穗深四地图书馆与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主办。

※8 月 24 日，东莞图书馆推出“阅美空间 传递文明”系列专题宣传，精选一批环境优美、藏书丰富、文明氛围浓厚的高品质阅读空间开展介绍，提升城市阅读驿站和“·莞”空间影响力。

※8 月 27 日，2026 东莞阅读季暨南国书香节东莞分会场活动在南城海德汇一城启幕，淘书集、趣看展、创工坊等活动精彩纷呈，其中“好有品”阅读市集在五天展期中迎来约 26.2 万人次的客流。

※9 月 2 日至 9 月 27 日，东莞图书馆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联合主办“文白之变：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展览，展出了《新青年》杂志原刊、鲁迅信札等 30 件珍贵藏品。

※9 月 11 日，东莞图书馆推出“向深蓝潜行：共赴生命秘境”沉浸式深海生命科普展，将实物模型、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融入展陈，深受欢迎，截止 10 月 8 日，已接待市民约 2 万人次。

※6 月 3 日，广东图书馆学会发布《关于广东省第十六届盲人诗歌散文朗诵暨 第十二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获奖情况的通报》，东莞参赛选手梁莹、黄奕桐分获散文创作大赛、朗诵大赛的优秀奖。

※7 月 15 日至 18 日，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广东图书馆学会、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共同主办，佛山市三水区图书馆承办的 2026 年广东省公共图书馆馆长领导力提升培训班在佛山举办。

※8 月 24 日至 27 日，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图书馆学会主办，珠海市香洲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的 2026 年广东省“繁星计划：基层图书馆员赋能行动”：新入职馆员基础业务培训班在珠海香洲区图书馆举办。130 位新馆员参加了培训。

※9 月 22 日至 24 日，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主办，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学会承办的 2026 年阅读推广理论研讨会在甘肃兰州举办，近 200 名行业代表、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9 月 16 日至 19 日，以“全民阅读主阵地：AI 时代的图书馆”为主题的 2026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年会设置主题会场、分会场、卫星会等 28 场学术活动，同期举办图书馆展览会、“图书馆人之夜”等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共计 3000 余人参加活动。

※9 月 18 日上午，由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主办，东莞图书馆承办的中国图书馆年会主题会场“全民覆盖 • 普惠高效：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建设与图书馆力量”在成都市东安书院举办。



东莞图书馆高埗分馆

东莞图书馆高埗分馆新馆于2025年4月正式开放使用，是东莞市推进文化强市建设以来首个建成启用的镇街公共图书馆。新馆位于高埗镇科创中心四楼，建筑面积约3300平方米，阅览座席超400个，馆藏量达20万册。新馆采用“双灯塔”造型设计，传递“书籍是屹立在时间汪洋大海中的灯塔”的理念。馆内遵循“分龄分众”服务思路，打造综合借阅区、少儿借阅区、绘本馆、自助馆、特藏区等功能区域。采用RFID技术管理图书，配备自助借还机、电子书借阅机等现代化设备。新馆的建成启用实现了高埗分馆由传统阅读空间向新媒体阅读空间、交互式阅读空间、多元文化空间的转化。

高埗分馆充分发挥全民阅读推广主阵地作用，综合开发利用馆藏资源，积极深挖高埗地方文化资源，充分融合红色文化、水乡文化及非遗资源等优势，倾力打造“阅美·四季”阅读推广品牌，围绕“阅读季”“阅讲季”“阅庆季”“阅创季”四季主题举办“小灯塔故事会”“诗韵高埗”“暑期阅读营”“阅美四季 法韵书香”“创想课堂”等系列活动。截止2026年8月底，新馆进馆人流量约70万人次，累计外借量约32万册次，举办阅读推广活动、线上数字阅读资源推广以及主题展览等活动410多场，参与群众20多万人次。

书香为帆、灯塔为引，高埗分馆将继续深耕全民阅读主阵地，以更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持续擦亮“书香东莞”文化名片。